**浅析教育资源分配平衡的影响**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甘露泽雨乡村振兴实践团调研组**

**指导教师：白一鸣**

摘要：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100周年之际，为响应国家号召，为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推进乡村振兴青年赋能活动”，积极配合国家双减政策，甘露泽雨小队于暑期前往广西于暑期开展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支教地位于广西省河池市金城江区，于金城江区第五小学展开支教活动。将以广西河池的教育资源分配作为参考，探讨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针对教师资源的分配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教育资源分配、分配影响，相对公平

目录

[一、调研背景介绍：有关目前教育资源分配的简述 3](#_Toc112225483)

[1、调研原因 3](#_Toc112225484)

[2、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现状： 3](#_Toc112225485)

[2.1地区间的差异 3](#_Toc112225486)

[3.政策的影响 7](#_Toc112225487)

[4.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和利用的差距 8](#_Toc112225488)

[5.生活环境对教育其他影响 8](#_Toc112225489)

[6.基础教育的影响 8](#_Toc112225490)

[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分析 17](#_Toc112225491)

[（1）经济原因 17](#_Toc112225492)

[（2）经济实力不均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 19](#_Toc112225493)

[（3）经济发展重心带来的教育取向性发展 21](#_Toc112225494)

[政策原因 24](#_Toc112225495)

[3.观念原因 29](#_Toc112225496)

[1）各地区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29](#_Toc112225497)

[a.教育理念分析 29](#_Toc112225498)

[2) 社会层的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30](#_Toc112225499)

[a.社会教育理念差异体现 30](#_Toc112225500)

[B.差异导致对教育资源的投资存在差异 31](#_Toc112225501)

[3) 不同家庭的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32](#_Toc112225502)

[a.家庭教育理念差异体现 32](#_Toc112225503)

[b.差异导致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存在差异 35](#_Toc112225504)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均带来的影响 36](#_Toc112225505)

[（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盲目“军备竞赛” 36](#_Toc112225506)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在疫情时代下的影响加剧 37](#_Toc112225507)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38](#_Toc112225508)

[（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影响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 39](#_Toc112225509)

[（五）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匀会损害公众对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预期，更容易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40](#_Toc112225510)

[（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将会造成政府形象和作用的扭曲，触及社会公正底线 40](#_Toc112225511)

[（七）乡村教师受地域限制，对于本土的文化适应能力薄弱 41](#_Toc112225512)

[（八）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对于文化包容性存在差异 42](#_Toc112225513)

[（九）教育资源处于弱势地区孩子们无法完全掌握主流教学重点 43](#_Toc112225514)

[（十）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易出现教育城镇化过快所带来的问题 44](#_Toc112225515)

[（十一）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学生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45](#_Toc112225516)

[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解决措施及建议 46](#_Toc112225517)

[经济发展是基础，鼓励“共享经济”的发展。 46](#_Toc112225518)

[教师资源的分配建议 47](#_Toc112225519)

[坚持公费师范生补贴制度，优化生活成本政策 48](#_Toc112225520)

[利用互联网提高改善生活条件后公费师范生的增加收益，提高阈值 49](#_Toc112225521)

[运用科学技术，建立数据库，多角度多层次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50](#_Toc112225522)

[职称评聘制度向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倾斜，为乡村教师开通绿色通道 51](#_Toc112225523)

[关注乡村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51](#_Toc112225524)

[职业发展探索建议 53](#_Toc112225525)

[参考文献： 55](#_Toc112225526)

# 一、调研背景介绍：有关目前教育资源分配的简述

## 1、调研原因

客观原因：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早期政策的倾斜，使得在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汇聚具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而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教育需求使得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资源聚集能力较大，教育资源不会主动流入欠发达的地区，长期以往势必造成区域间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而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在阻挠高质量教育普及的同时也会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诱因，希望能通过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调研来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来促进中国教育格局的改观。

主观原因：北京科技大学甘露泽雨乡村振兴实践团前往广西省河池市金城江区支教，在支教过程中感受到当地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并由此启发从学生、家长、老师等角度开展教育资源分配现状分析的调研。

## 2、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现状：

### 2.1地区间的差异

首先中国教育资源的分不均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异有关，再细化地区的教育 的差异则与不同地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关。

教育是培育人的社会活动，自然会受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总体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在地区集中于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中，而欠发达地区和同一地区的农村教育资源较少，其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尤其不均。以下将从高考情况、师资情况、教育投入方面展现当代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教育资源较大差距的背景信息。

以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为例，对比国内不同省份、自治区高考的竞争压力。王曦调查到，2016 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为 940 万人，普通高校本科招 生计划 374 万人，本科录取率达到 39.79%，虽然总体上本科的录取率较高。但是这一录取比例具体到各省区和地区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我国共有各类普通高校两千五百余所，分布于 31 个省区，省区间数量差距悬殊。高校数量最多的江苏省拥有各类普通高校 166 所，而最少的西藏自治区仅有 6 所。虽然高校的招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但是我们仍需意识到，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规模往往是最大的，而山西、安徽、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西藏等省区较北京、上海、江苏、陕西等省份的学生有着更高的高等教育升学压力。

而在同一省份，不同地区，城乡间的教育现状和资源分布也不均衡。以2022年四川高考为例，成都、绵阳作为四川生产总值前两位的较发达城市，本科率超过50%，一本率超过20%，而四川欠发达的阿坝、甘孜等地，本科率不足15%，一本率不足3%。

以下将从学校分布、师资和教育体系建设、家长、学生教育观念、教育政策、教育资金、其他生活因素等角度介绍现阶段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

1. 教育资源尤其是学校的分布不均

义务教育阶段，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各地市优质中学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广西示范性高中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特点。截止2021年7月，南宁市拥有全区数量最多的示范性高中，共计26所，占全区16.7%。其次是桂林市19所，柳州市16所位列第三。百色市示范性高中数量为14所，相当于南部沿海的钦州、北海和防城港三市的示范性高中数量总和，教育资源分布失衡，优质教育获取难度不均。一是优质教育资源获取难度存在地市差异。不同城市考生考入示范性高中的难度各异。以玉林市为例，玉林市人口数量广西第二，达579.68万人，但其示范性高中数量仅11所，数量甚至低于河池市（总人口341.79万人）的13所。玉林市示范性高中招生名额竞争系数（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通过当年报名参加中考人数与各示范性高中招生人数计算得出）为6.1，相当于每个名额有6个左右的考生竞争，远高于百色市（3.6）、南宁市（3.4）、河池市（2.8）和钦州市（2.5）等地市；二是不同地区高中教学质量差距悬殊。目前，南宁、柳州和桂林教育质量名列全区前列。2020年高考中，南宁和柳州等地有多所知名高中一本上线率超80%，而许多城市示范性高中一本率均在50%以下。除此之外，广西有不少县，整个县的一本上线人数为个位数。例如，当年广西凤山县全县仅2名学生上一本线，一本率不到0.2%。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不同地区的初中教学质量水平差距悬殊，南宁、柳州、桂林集中了几乎所有好的教育资源。

而在高等教育阶段，以“985 工程”高校为例，我国 共有“985 工程”高校 39 所，除国防科技大学为军事类院校 外，其余 38 所普通类高校分布在 18 个省区。北京市拥有“985 工程”高校数量最多，为 8 所；其次是上海市，为 4 所，这两个 地区占据了此类高校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余的分别为天津 2 所、辽宁 2 所、吉林 1 所、黑龙江 1 所、江苏 2 所、浙江 1 所、 安徽 1 所、福建 1 所、山东 2 所、湖北 2 所、湖南 2 所、广东 2 所、重庆 1 所、四川 2 所、陕西 3 所、甘肃 1 所。另外，我国“211 工程”高校共有 112 所，分布趋势与“985 工程”高校基本一致。学校集中于一些个别省份，而很多省份甚至没有一所985大学。

除此之外，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总体也呈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在重点中职院校的分布上，最多的山东省拥有重点中职院校210所，最少的西藏拥有重点中职院校3所。各省市重点中职院校分布数量并不均等，学校数量较多的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辽宁、四川这些省份，并且这些地区重点中职院校数量占所有中职院校的比重均高于全国31省市的平均占比。而农村地区，农业领域和民办的职业教育与其他职业教育类型相比城镇的职业教育水平的资源差异很大。而成人教育方面，中东地区的成人教育发展明显快于西部地区，社区教育、成人对接平台、成人高等学校的建设较完善，表现出不同地区的资源分布的不均。

#### 2.不论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地区的师资和教育体系差距明显。

（1）在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根据教育部2022年4月公布的数据，农村的幼儿园数量大于城镇幼儿园数量。在农村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仍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经过几年建设，全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学率由2011年的62.3%提高到2021年的88.1%，增长了25.8个百分点，中西部，“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入园率显著提高，甘肃临夏州从15.8%增长到95.5%，云南怒江州从25.6%增长到90.01%，学前教育实现了基本普及。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较城镇师资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数据表明，全国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总数为322.18万人。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区幼儿园园长与专任教师共有155.95万人，占全国的比重为48.40%;镇区幼儿园园长与专任教师共有112.60万人，占全国的比重为34.95%;乡村幼儿园园长与专任教师数量最少，共有53.64万人，占全国幼儿园教职工数的16.65%，不足五分之一。可见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城乡分布不均现象严重，乡村学前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2）在义务教育的初高中阶段，城镇教师无论从学历教学水平上都高于欠乡村。据教育部的《中国教育统计数据》，城区小学研究生 毕业的教师大约占 5%，而镇区小学和乡村小学都是没有的；城区小学的 本科教师大约，镇区小学的本科教师占比不足 50%，乡村小学再 次之；城区小学专科毕业教师大约占 20%，镇区小学的专科教师占比 45%左右；乡村小学的专科教师占比超过 50%。可见乡村小学的教师，以专业毕业生为主，而城区小学的教师以本科毕业生居多，师资队伍与 教学设施往往成正比关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拥有更优越的教学设施高学历的教师也更倾向于留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因此经济较发达 的地区往往同时拥有较好的教学设施和优秀的师资队伍。

（3）高等教育方面也与区域发展相关。有些省份高等教育资源较为雄厚，以为2017年为例，我国高等教育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山东、河南、北京、湖北、四川、河北、陕西、湖南、辽宁。这11个省（市）累计高等教育教职工总数占全国的比例高达58.47%，而甘肃、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7个省（区）的高等教育教职工总数占全国的比例较低。这与2017年各省份生产总值的高低分布基本一致。伴随着高校的扩招政策，本省的学生比省份高等教育资源贫瘠的学生更有优势，也更可能获取高等教育。

根据调查，地区高等教育层次还与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相关。如果根据相关论文通过毛入学率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普及化地区”（毛入学率≥50%）、“后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40%-50%）、“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15%-40%）。相关论文调研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低的地区对普通高等教育的依赖性越强,其研究生教育越不发达,进而高等教育发展层次越低,同时高等学校质量越低,也就是新建本科院校越多;本科教育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贡献基本没区别,专科教育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贡献较大;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的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越发达,尤其是网络本专科教育,而“后大众化地区”和“大众化地区”的网络高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潜力。

正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受地区义务教育水平影响，在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制约下，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往往相较欠发达的地区，有着更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因此可以发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的层次较高，本科、研究生、成人的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 2.不同地区，家长对教育的投入和观念不同。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北京、辽宁、浙江、江苏等教育较为发达地区的家长对补课的接受度较高，其中家长所受教育年数越高越支持。在调查的广西、山西等地区的家长和学生离开家乡读书意愿的调查中，大部分表示“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孩子锻炼自己的能力”“想要看看其他的地方“。家长以及孩子的意愿很大一部分受不同地区就教育的观念和教育现状影响。

以中国东西部作对比。由于东部临海，并且地形平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促使了现代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自古代，东部地区便有众多新兴学堂，这些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东部人才的积聚，使得东部先天就较好的教育观念萌发的土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儒学治学教诲自南宋就自东部广为传颂，读书作为”唯一出路“使得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在农村以及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教育观念相对较为落后，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看法和视野则显得较为局限，而这些教育观念受父母的教育水平，地区生产就业现状有关，并会对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投入和孩子教育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以家庭观念为例，家庭的教育观念是在家庭策略的实践中形塑的，而家庭策略既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强弱，也取决于家庭目标的定位。研究表明，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总体呈现出家庭收入越高，对教育的投入越多，教育占总花销的比率越高的趋势。城镇家庭的对自身家庭目标的定位较高，因此更愿意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在教育焦虑感和对投入上远高于农村家庭。

同样是农村地区，在江浙沪地区和西南地区，李永萍经调研发现，江浙地区的普通农民家庭能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更多。源于农村与市场的结合，江浙地区的农户有较强的资源积累能力，经济基础较强，比较重视人力投资建设，在监督孩子学习的同时，还会给孩子报提高成绩的一些课外课程，要求子女至少要读专科。西南地区的农户土地资源较为匮乏，农村离市场较远，当地的岗位需求较少。在支持孩子的教育方面，普遍有种“顺其自然“的观念，当孩子幼时展现有读书的天赋，父母便会重视起孩子的教育，反之则会降低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甚至出现辍学的情况。

相关观念还会影响在父母双方子在子女教育上的参与水平。尤其是家庭教育，父亲和母亲是缺一不可的。-一般来说，母亲相对感性和细腻，她们在与儿童相处的过程当中，更关注孩子的情绪、习惯、健康和安全问题，而父亲相对更加理性和粗犷，往往更鼓励孩子积极的去尝试、冒险，这对孩子身体素质的发展，对孩子教育中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 3.政策的影响

过去由于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紧张，资金优先流入条件较好的城市优先发展教育，再逐级下放。长期以来实行城乡教育的二元政策，使得我国城乡教育指标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显著进展，全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20年的10.8年。

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政策在缩短不同地区教育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家的政策缩小了男女、城乡的教育差距，促进了教育均等化。但也受微观的诸如家庭观念、子女情况的等因素影响。总体而言，国家通过将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减少了贫困人群孩子辍学的现象。这些政策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对缩小西部和城乡教育差距的作用明显。

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域间布局始终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失衡问题，这本身就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不论是“211”高校还是“985”高校，高校总量的一半都在东部地区分布，东部地区的占比超过中西 部占比相加的总和，建国之初，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急需人才，中央集中财力建设少量的重点大学，该时期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模式主要效仿前苏联，工作中心向重点大学的布局和调整倾斜。改革开放后高校的发展和布局迎来转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的颁布与实施，使高等教育的协调 发展被提上日程，但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域布局政策始终未突破原有的制度壁垒。

在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和迈入高等教育的考核政策和机制上。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现在普遍采取进就近入学的政策，孩子的学校与父母的工作地、户口与家做在地址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在教育欠发达的地区的孩子会进入当地教育水平较低的小学和初中，从而进一步在学习基础上影响孩子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获取。高考采取全国大范围统考的形式，并以省、自治区为单位进行的统一招生机制，在确保公平的同时，也使得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进一步进入高校深造竞争力不如城镇等发达地区的学生，目前高考中对少数民族、贫困人群的支持总体合理，在促进教育平衡的同时保证了应试的公平、公正。

## 4.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和利用的差距

相关调查发现，教育经费和升学率在1995年之后大幅上升，教育经费的增长还伴随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的显著调整。在省际差异上，教育经 费和升学率都在大约2005年之后出现了地区均衡性的显著改善尽管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在不断缩小。但是经费作用的城乡差异表明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仍有挑战。且一般来农村教育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更高，农村也更容易面临吸引优质教师的困境。

相关资料表现非公共财政经费与升学率之间有更高的正相关性。因此，经费筹集能充分吸纳非财政资金，例如企业或公益组织等，会有利于提高升学率;财政经费的投入也因此需要在未来制定更多细则，提升使用效率。

而在经费的支出结构中，个人部分支出对改善升学率最为有效。个人部分支出的最主要构成是教师工资福利，提高教师待遇可能是改善升学率较有效的途径之一。但不同地区在教室福利方面仍有差距。在较发达地区教师的薪资基本与当地公务员薪资持平或略高于，而在山区很多教师薪资为2~4k较城市教师有明显差距。而这在个人部分支出的差距问题在某些财力不够的地区尤为重要，如何提高资金，如何提高资金中的教师待遇不仅有助于改进薄弱地区的教育质量，也有助于补足地区短板，促进教育水平平衡。

## 5.生活环境对教育其他影响

城市较为丰富的教学活动、生活服务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孩子在接受较多维度教育的同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和课外知识兴趣上的培养和拓展。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学习之余还必须参与父辈的劳作，承担家庭的部分劳作和生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学习资源较为有限的获取使得在知识范围和社交能力上可能会略显欠缺。

在教学设施上，经问卷调查和笔者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16日的走访发现近乎所有的家长与学生都对当地的教学设施满意，这一方面城乡的差距较小，对教育的影响较小。

## 6.基础教育的影响

（一）学前教育发展迅速。在过去的70年里，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到2018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6.67万所，学龄前儿童1863.91万人。公园里有4656.42万儿童。幼儿园教师和工作人员453.15万人;专职教师258.14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1.7%。

（二）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中小学入学率的稳步增长，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进一步巩固，普及水平超过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8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0.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1]](#endnote-0)]此外，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也在快速增长。2003年高中毛入学率仅为43.8%，2018年达到88.8%，翻了一番。201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规划(2017-2020)》。根据攻坚计划，到2020年，高中教育将在全国普及，各省(区、市)高中毛入学率应达到90%以上。

（三）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的学生规模正在扩大。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4.5亿人口中，80%是文盲。截至2017年，中国13.9亿人口的文盲率已降至4.85%。从1949年到2019年的7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的规模一直在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数据，全国小学生人数从2439.1万人增加到10339.25万人，增长4.2倍。初中生从83.18万增加到4652.59万，增长55.9倍。普通高中在校生由20.72万人增加到2375.37万人，增长114.6倍。

虽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纵观全球教育发展，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教育中非常大的一个漏洞便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也带来了较多且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将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导致人才的流失，甚至会影响到公民价值观的取向问题，会导致一些群众会对偏远地区差别对待，戴上“有色眼镜”等。因此，推进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势在必行，甘露泽雨乡村振兴实践团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支教的初心也在于此，希望能够通过自身力量，为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做出自己的贡献。

教育资源也被称为“教育经济条件”，其主要是指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总和。人力资源包括教育者人力资源和受教育者人力资源，即在校生数、班级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行政人员数、教学人员数、教学辅助人员数、工勤人员数和生产人员数等。物力资源包括学校中的固定资产、材料和低值易耗物品。固定资产分为共用固定资产、教学和科学研究用固定资产、其他一般设备固定资产。

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对于推进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作为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国家，占地997万平方公里，却只有3800万的人口。但是，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最新一轮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 即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该计划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筹划，对全世界15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最早开始于2000年，每三年进行一次。该计划旨在发展教育方法与成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中，加拿大是少数几个同时出现在数学，科学及文学排名前十的国家之一。[[[2]](#endnote-1)]

这些成果主要归功于五点，首先第一，具备着完善的教育体系，加拿大的教育体系设计更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迫于升学考试压力，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而到大学，却严进宽出，导致大部分人进入大学之后开始松懈。加拿大的学制基本和国内一样采用6+3+3的方式，但大部分学生在儿童、青少年时期都在玩乐中学习，天性和特长得到了充分发展；第二、注重能力培养，学以致用。中国教育多为一种灌输式教育，先将成人的经验告知学生，让学生按已有成功经验去操作。而加拿大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发现难点，然后在解决难点中积累经验，最后得出结论，在这种发现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研究的成果。加拿大教育大多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通常会鼓励学生自己去图书馆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同时教师也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第三、校企合作紧密加拿大职业教育灵活的学习制度、完善的监督体制等制度优势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其实促进加拿大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并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其有效的校企合作机制，可以说加拿大职业教育源于企业、溶于企业。第四、教育成本投入高加拿大政府一直秉持教育不产业化的原则，加拿大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占全国GDP的总比例位居全球第一，对教育上扶持更是全球首屈一指。根据各国府在研究生（post-graduate）教育领域的投入数据，加拿大稳居世界第一。

最后一点，即为最为重要的内容，加拿大有着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与中国教育资源非常集中的特性不同，加拿大的教育资源分配非常平等。 加拿大公立教育体系中，名校形象根本不刻意塑造，教学资源都是平均分配，从学生到学校，彼此之间感觉差别不大，所以加拿大没有所谓的学区房，每个社区都有好学校。在加拿大，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这也使得在同一省份内，因地区和经济因素导致的学生学术能力差异不大。在PISA中，同一省份内学生的分数差异只有9%，而法国高达20%，新加坡则是17%。所以在考虑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太较真那个“排名”，学生接收到的教育质量不会有很大差距。公平，让加拿大的教育成果更加显著。因为这里不会有因为贫穷而导致的“失败”。然而，在我国，优良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这种教育分配上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而且城乡的教育资源配置总量也较为短缺。近年来，我国以占世界教育经费的1.5%的比例培养着世界20%的教育人口，因此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国是在以极不对称的经费维持着众多的教育人口。[[[3]](#endnote-2)]

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表现主要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意识都处于领先地位, 教育意识和教育投入都大于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因此呈现中西部的不均等。据《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课题小组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的教育投入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 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五省的教育投入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 相关数据显示: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东西部差距在拉大。教育资源极端不平衡的分配格局, 使中西部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长期以来, 在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 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1]。城乡教育投入差距巨大, 尤其是在落后偏僻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的投人大大少于城市。就数据来看:2001年生均教育经费我国城镇小学生经费是农村的1.86倍, 初中经费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1993年, 贵州省内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之间的差距为3倍, 初中阶段, 贵州省内城乡之间达到4.2倍[3]。

(三) 教学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城市师资充沛, 教学设备完善, 有才能的教师大多选择前景好的城市重点学校任职, 且农村教师专业性不强、在职培训困难, 待遇偏低, 导致农村师资极度缺乏。有数据显示2005年城市初中高级职称比例为12.36%, 而农村仅为2.33%。地方政府播发的津贴难以落到实处, 迫于经济的压力, 导致农村优秀教师向教育资源充沛的学校流动, 使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师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陷入“强校更强, 弱校更弱”的恶性循环。[[[4]](#endnote-3)]

通过网络上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教育资源分配的表现。最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户籍、收入分配水平、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明显的隔断。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隔断被逐步打破，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依然很明显。所以，通过从专任教师的学历构成、专任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构成、每万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电脑台数和多媒体教室间数等指标，来分析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分配情况。

1. 在校学生的城乡分布

2010年6月我国开始实施《统计用城乡划分代码》，新的城乡划分标准将原来的城市、县镇、农村三个分类调整为三大类七小类，即城区（含主城区、城乡结合区）、镇区（含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特殊区域）和乡村（含乡中心区、村庄）。我们首先来看，中小学在校学生在城区、镇区、乡村间的分布。[[[5]](#endnote-4)]



如上表所示，2016年我国有小学在校生9,913万人，城区、镇区、乡村小学的在校生占比分别为33.0%、37.9%和29.2%；有初中在校生4,329万人，城区、镇区、乡村的初中在校生占比分别为34.4%、50.2%和15.4%，与小学阶段相比，初中阶段乡村学校在校生的比例明显降低，而镇区初中在校生的比例有相应的增加。同年，高中在校生有2,367万人，其中乡村高中的在校生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了3.2%，而城区高中的在校生占比提高到了47.0%。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大约有一半学生在城区的高中就读，一半学生在镇区的高中就读。我们考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按照我国分级办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县镇一级办高中，所以本身乡村的高中就很少，所以农村的初中毕业生要升入普通高中的话，都入读了镇区或城区的高中。第二个原因就是高中升学率还是城区和镇区要高于乡村。

1. 生师比的城乡差异

生师比（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一直是衡量教育资源投入的重要指标。下表表示的是城区、镇区、乡村的中小学生师比的差异。可见，在普通高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生师比分别为13.0、14.3和13.7；在初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生师比分别为12.8、12.6和11.0，城乡间差异都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小学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生师比分别为18.8、18.1和14.6，城镇学校的生师比明显高于乡村学校。这也许是由于乡村小村一般规模都比较小，致使教师资源不能达到高效率的配置。也许是由于乡村小学的教师中专任教师的比例比较低。



1. 专任教师的学历构成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将学校专任教师学历由高到低分研究生毕业、本科毕业、专科毕业、高中阶段毕业、高中阶段毕业以下这五个等级。由于高中阶段毕业和高中阶段毕业以下这两个等级的教师人数非常少，所以分析中将这两项合并。



上图表示的是普通高中、初中、小学阶段专任教师学历构成的城乡差异。如图所示，在普通高中阶段，专任教师的90%是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比例城区学校略高于镇区学校，但整体来看差异是最小的。在初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专任教师中大学专科毕业生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分别占比10%、20%、24%。在小学阶段，城乡间差异进一步扩大。乡村小学的专任教师中有11%是高中阶段毕业或高中阶段毕业以下，42%是大学专科毕业，37%是大学本科毕业。镇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46%和48%；城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30%和66%。总之，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学校专任教师的学历构成城区学校高于镇区学校，镇区学校高于乡村学校这一不均衡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

1. 专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构成

下图表示的是中等教育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专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构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中，中学专任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分为中学高级、中学一级、中学二级、中学三级和未定职级五个等级。由于中学三级教师的占比非常小，所以，在本文中将中学三级和未定职级合并统计。如下图所示，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中，中学高级和一级教师的比例城区高于镇区，镇区高于乡村；另外，这种城乡差异普通高中阶段高于初中阶段。[[[6]](#endnote-5)]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中，小学专任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包括中学高级、小学高级、小学一级、小学二级、小学三级和未定职级六个等级。由于小学三级教师的占比非常小，所以，在本文中将小学三级和未定职级合并统计。下图表示的是城区、镇区、乡村小学专任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构成。如图所示，专任教师中拥有中学高级教师和小学高级教师职务的教师比例，城区和镇区的小学略高于乡村小学，但整体来看差异不是很明显。



（五）硬件设施

我们通过教学用电脑、多媒体教室、图书这三项硬件设施的指标来分析中小学校硬件设施配备的城乡差异。从下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每万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电脑的台数，每万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的间数，还是每名学生拥有图书的册数，也无论普通高中、初中还是小学，都是城区高于乡村、乡村高于镇区；而且乡村学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镇区学校低于全国平均。



以上从生师比、教师学历构成、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构成、硬件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状况。大体来看，小学阶段的专任教师学历构成、高中阶段的专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构成在城乡间差异比较大，且城区优于镇区，镇区优于乡村。但是教学用电脑、多媒体教室、图书这些硬件设施，乡村学校优于镇区学校。

诚然，本文只是探讨了一些可以用数据表示的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分布的状况；而有一些指标是不能用数据衡量的，比如英语老师的口语水平、语文老师的文学素养、硬件设施的使用率和使用效果等。这样的城乡差异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我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

1. 地区和城乡差距 造成教育不公平。目前，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
2. 政府规定执行不力 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进入1990年代末，各方面都出现了乱收费。教育也不例外。本来乱收费是要进行整治的，但是由于教育的乱收费，某些主管部门有提成，再加上乱收费的优质学校收入高、受益大，很多权贵名流子孙多通过走后门在这些学校就读，于是他们的话语权处于强势。造成整治乱收费行为对这类学校进行妥协，使反对乱收费的做法退到“三限”标准，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而且只适于高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规定的执行力仍然进一步被弱化，乱收费不仅限不了钱数、人数和分数，而且还把这种仅适于高中的规定，扩大延伸到优质的初中和小学。初中、小学、高中收取择校费的情况此起彼伏，力度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有钱、有权的子女就读优质学校，无钱、无权的子女则入优质学校无门。
3. 制度设计偏颇 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一是就近入学存在问题。义务教育应该就近入学，但是就近的学校是优质学校，如果不拿钱，即便学校守在家门口也不能入学。家离中关村某小学不足50米，由于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各方有钱人都盯着这个学校，愿拿钱让孩子入该校读书，于是学校便把附近的孩子排斥在外，孩子只好去离家约1.5公里，要过4个路口的小学就读。为了孩子上小学，常年风雨无阻进行接送。
4. 学生家庭收入过低 造成的受教育不公平。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的政策，使得义务教育阶段人人可以入学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家庭贫困，再加上高中、大学收费偏高，仍然造成一些贫困学生面临上高中、大学的困难。特别是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家庭收入低的孩子明显减少。在河南信阳，当年90%以上是农民的孩子，而今农村的孩子大为减少。我们在学生宿舍发现，多数学生床下从这头到那头摆满了鞋子，而床下只有一双鞋或只有一双拖鞋的孩子，只有几个。校长说，床下鞋少的都是家庭收入较低的、来自农村的学生。驻马店市黄淮大学办了一所与国外大学合办的学院，这个学院因三年后可以出国续读，收费较贵，在本地居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造成大学虽然在本地，可能上学的多为外省发达地区的学生。又如，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到6%以下。北京某名牌大学报到薄显示，农民的孩子也已降到13%。这同中小学中农民子女占在校人数70%以上相比，呈现出过分悬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发达地区的学生们能更多更好的接受好的教育资源，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能够在尝试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向往的方向。一个人此生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是不容易的，要是能让自己的兴趣变成奋斗的方向更是难能可贵的。但反观西部教育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学生们缺少必要的教育硬件资源、优秀的师资力量，延续老套的教育方法……长此以往东西部教育的差距会逐渐拉大。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教育事业需要全面发展。东部教育发展和西部教育发展同等重要。郑强教授曾说:“中国梦不是只有东部的学生有梦，西部的学生们同样拥有梦想，寻找个人价值，把自己奉献给祖国。”要让学生们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教育资源合理分配是很重要的。不能只专注某一地区的发展，要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地区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东部地区应该积极带动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为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输送人才，为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教育发达地区应将优秀教育理念传递给西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使这一理想化的教育蓝图变为现实是需要多方资源的投入，需要时间的验证。教育不公不仅体现在城乡教育，在高校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差距。普通高校和名校相比不仅在教师、设备、财政上有巨大的差距，而且还会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同时当下的高等教育也并不完善，与其追求课程的丰富、多与杂，不如更多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也希望国家和政府更多地关注普通高校，将名校略显富余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大学生占绝大部分的普通高校，他们在社会顶层的比例可能不高，但是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和中坚力量，如果资源和条件能有一定的优化，相信这些普通高校也能走出更多的领军人才、同时也能打牢社会发展的根基。

# 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分析

## （1）经济原因

根据刚刚提到的所简述的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现状，我们在调研的同时分析出了以下三点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主要分为经济，政策，人群观念三点原因，其中经济因素是后两者的基础，所以在探讨因素时我们首先对经济因素进行剖析。

关于经济因素所带来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下分为三类大方向原因：

由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收入差距

a.地区收入差距

从我国区域地带划分，在十一五规划中，将经济区域划分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关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情况如下：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间差异明显，从各地区生产总值（GRP）来看，在1980—2005年间，东部10省市实现GRP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43.6%迅速提高到55.6%；而中部6省所占比重由22.3%下降到18.8%；西部12省区市由20.4%下降到6.9%。这说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总量和生产力布局在逐步向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集聚，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扩大态势。

从各地区生产总值（GRP）来看，在1980—2005年间，东部10省市实现GRP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43.6%迅速提高到55.6%；而中部6省所占比重由22.3%下降到18.8%；西部12省区市由20.4%下降到6.9%。这说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总量和生产力布局在逐步向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集聚，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截止到目前来看，受近年疫情状况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平缓，但仍存在不小差距，延伸了2005年后的扩大态势。

从地区间居民收入来看，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东、中、西部差距比为1.44:0.98:1;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3.741.30：1。由此可见，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除此之外，区域经济两极化发展态势也比较严重，覃成林对改革开放以求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区域之间的相对人均收入分异程度在1990—1999年间扩大，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快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1978-1999年问，东部的十个省份形成了一个高收入组的趋同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内蒙古、山西；而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广西则形成了一个低收入组的趋同地区。可见，在20世纪90年后，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区域经济增长两极分化的格局。

在高收入趋同地区，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也高，反而低收入地区就没办法达到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并且拉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不同地区收入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应地区的人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多少，就目前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未来仍然会存在，但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逐渐对东、中、西部进行统筹规划，相信教育资源的分配差距也会不断缩小。

b.人群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的职业分化，资源分配，竞争过度，行业垄断，制度差距等一些因素都会影响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分化差距，由之前所提到的，收入的差距是影响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投入的主要因素，以下是关于这些原因的深入分析：

首先，中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由于信息技术以及智能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劳动力被先进的科学技术所淘汰。如同大型超市开始采用智能自助买单的方式，这减少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机会；而普通工作者的竞争机会不均等造成收入差异的鸿沟越来越大。少部分个人凭借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自有社会资源的优势快速积累了财富，但缺乏社会资源的个体则缺乏相应的机会为自己争取财富。

除此之外，社会资源的分配使得收入差距逐渐变大。长期以来，城市户口、学区房等东西都成为了阻挡人口流动以及阶层流动的拦路虎，各种规章制度和已有的经济水平也限制了个人更上一层的发展空间，而且虽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之中，但是经济的运行体制还不够健全。正是因为经济管理制度的缺陷，所以各种“灰色经济”“腐败经济”等非法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

各地区的人民受到生活以及就业的地理资源环境的影响，使得在收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北上广深的的劳动者工资收入普遍比其他城市要高;部分中上层阶级的家庭存在一定的“隐性世袭”制度；部分高干子弟其凭借已有的知识、资产以及人脉资源掌握社会的资本动向，其起点高于绝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

我国税收制度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大部分普通的工薪阶层都会按时按规的履行相关税务义务，但是部分高收入者会使用不同手段进行税务逃避。行业的垄断以及部分利益集团的制度性歧视同样作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相关企业安排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游戏规则，争夺社会资源，压缩普通人民的利益空间。例如“内卷”现象、“996模式”都使得普通劳动者更多的劳动付出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个人收入差异的扩大。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地域角度还是从人群的角度，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关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长久性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造成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重大原因，解决这一难题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信在我国不断地规划带领下，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减少收入这一因素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

## （2）经济实力不均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第一点所说，我国经济实力水平仍存在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等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资源分配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具体分为关于地区间分配失衡，和教育人才分配失衡两种情况，以下对这两种情况做出详细解释。

a.地区分配失衡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改革步伐缓慢，使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差于发达地区，经费短缺，教师待遇低是主要因素。于是，经济不发达地教育的资源分配呈现层次性。

而在发达地区，由于当地政府对地区教育政策的大力支持，还有当地居民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较大等原因，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难免有所倾斜，而且我国人口分布也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在人口密集地区，急需教育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高，而这些地区刚好有获取教育资源、发展教育资源的资本，所以他们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占据绝对优势。

反观不发达地区，由于人口少，经济落后，相关政策落实同步缓慢，所以对于教育发展的需求，教育发展条件相对发达地区都比较低，所以同样的教育资源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吸引力也较小，而且不发达地区对于教育资源的争取竞争力也较低。

综上所述，以经济为主导的一系列原因造成了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力不同，对教育发展的需求不同，进而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当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

b.人才结构失衡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在教育资源里面，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但是近年来，各大高校毕业的教育人才更倾向于前往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发展，进而教育资源倾斜就更加严重，高水平高能力的人才往往对自己的发展环境、薪资要求就较高，所以人才一般不愿流向经济发展中低速地区或者二三线城市，这也就造成了人才结构失衡的局面，也极大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从地域上来看，在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里面：京沪位列前茅。从结果看，截至2021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长沙位居前十。2021年应届生、硕士及以上人才将简历投向一线城市的占比为20.7％、30.0％，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一线城市占比，应届生和硕士及以上人才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集聚，尤其是硕士及以上人才更倾向往一线城市集聚。

关于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且高能级城市人才跨区流动性减弱。分地区看，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战略定位，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部、西部、东北持续净流出。分线看，2021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4％、0.4％、-1.0％、-4.8％，受政策放宽影响一线人才持续流入，二线人才集聚放缓、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21年长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续集聚，京津冀人才净流出趋势放缓，成渝基本平衡，长江中游人才持续净流出。

北上苏汉人才净流入占比上升，城市群内人才流动为主流。北京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等原因，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直至2020年有所回升，2021年继续创新高，主因收入水平最高且2021年人才引进政策放宽；上海2021年人才净流入占比重回榜首且创近五年新高，主因上海新经济促进政策初见成效且落户政策放宽；2021年上海代替天津，成为北京人才流出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深圳近两年人才集聚明显，主因经济发展速度快、创新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人口承载力有限，近年也开始控制人口有序增长；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人才从广州净流向深圳；广州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且持续稳定增长，主因广州经济发展速度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

一些二线城市近年来对人才的吸引力也逐渐上升：苏汉人才净流入且占比呈上升趋势、杭宁人才净流入且占比稳定。杭州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人才吸引力排名稳居前列，主因杭州电商等产业发展迅速且平均薪酬超越广州在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成都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呈现由负转正的趋势，主因成都经济发展活跃、创新产业发达，并且“筑巢引凤”吸引人才；苏州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主要得益于苏州经济实力雄厚、2021年GDP增速位列重点城市之首，同时离上海最近、区位优势明显；南京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始终为正且较稳定，主因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且南京“宁聚计划”实施、落户政策宽松；武汉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主因“学子留汉”政策实施效果好，落户门槛宽松；长沙2017-2021年人才净流入占比较稳定，人才流入主要因为长沙生活成本低、文娱产业繁荣。

由此可见，人才的主要流向地离不开经济高水平发展、生活环境优越、基础设施建设良好、文化娱乐产业繁荣等要素，而这些要素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发达地区以及一二线城市满足该类要求的居多，所以教育等人才在选择发展地的时候目光也着眼在这些地区，导致了经济不发达地区人才流失，吸引力下降，这也就造成了人才结构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

## （3）经济发展重心带来的教育取向性发展

所谓的教育取向，指的是教育资源在优质地域、人才上的倾斜现象在这里我主要分为两点进行阐释，一个是优质资源取向，一个是优质人群取向。以下我将对这两点进行分别阐释。

a.优质资源取向

所谓优质资源取向，指的是当今教育发展重头倾向于一些“985”“211”“双一流”等高等学府，或是倾向于重点专业，一流学科，在偏远地区，发展优质学科能力薄弱等地区，政府关于教育资源的投入也相应减少，所以没有相关学科历史，专业历史，以及具有吸引力的高等学校的地区，所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难以竞争到优质教育资源，也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去发展相关教育基础条件，这也是造成了现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一个次要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因为一些学科的历史和发展时间有的长达百余年，所以要想从这一方面调配教育资源的分布是任重而道远的。不过当下的人口基数不断增大，“内卷”等现象逐渐出现，求学的人逐年增加，国家着力发展新兴学科、专业的要求也不断下发，所以关于教育资源的优质取向性分配这一问题，可以在国家政策调整和人民需求努力等情况下逐渐得到好转。

b.优质人群取向

这里提到的优质人群取向，与之前所说的人才教育失衡可能会有所重叠，不过这里我主要以“毕业大学生”为例，阐述相关人群情况，首先，经过调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5.3%的大学生愿意回到家乡就业。其余大学生还是愿意前往大城市考研求职或者留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发展。

其实原因显而易见，北上广等大城市同样作为中国国际化的大都市拥有其他二线城市无可比拟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数据显示，在2009年，拥有26家世界500强企业，高居全国之首，大城市行业多、领域广，就业岗位多，人才缺口大，而这同样也是刚刚毕业大学生的特点，他们充满活力、斗志与新鲜感，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同时，大城市优秀的人才更多、竞争更为激烈，当然，这里的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也更为完备，职场新人在这里也更容昜在短时间获得升职，也可以在这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例如《杜拉拉升职记》中拉拉就是在的大公司中在巨大的竞争下脱颖而出，谱写出一曲职场版灰姑娘的赞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诸如娱乐设施多，公共设施完备，医疗条件好等等。

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还应放到人生的梦想与追求上。我们在家乡上了小学或者中学，然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在我们挑选大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北上广等大城市，因为这里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这里可以开阔我们的界，增长我们的见识。例如，在《蜗居》中，海萍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办了自己汉语学校，而也只有在等大城市才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对汉语的需求，所以，正是因为在大城市，海萍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北上广这条路，虽然相较于返乡发展比较难，但可以走；有梦想，就要为之奋斗。民间艺人在农村的戏台子上演《汉宫怨》诚然也是一种选择，一种追求，但如果他们也能登上春晚、进入国家大剧院，站在好莱坞的舞台上为全世界人民演出那也是一种选择。

除此之外，大城市还有一个更吸引人就业的原因，虽然大城市求职不易，但潜规则总是少些。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一个女生是市的公务员笔试的第一名，但是靠这样的成绩要想通过面试，部人士告诉她最少还要拿出17万。中小城市动不动就被复杂的关系网包围，即使你是人才，如果没有后门，也很难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当前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市迅速发展、中小城市亟待发展，可是这些地方难道就一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吗？他们或许需要更多的农民工来拆迁、盖房子，也需要更多有经验的高手来规划新的发展，因此，在这里大学生的机会并不会比大城市要多，而且，刚刚提到过的，受关系网的影响，初出茅庐的生人脉不发达，机会有可能更少。换言之，中小城市并不能规避毕业大学生在北上广求职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中小城市不具备吸引力的一大原因。

总的来说，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一线城市发展配套设施齐全，聚集了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有相当多的岗位空间，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择业，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其次，大城市工资待遇高。专业相同、能力也相同的大学毕业生，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就业，工资的水平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例如：在北上广深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大学生进入企业后的基本工资会比一些中小城市高出不少。第三，个人进步快。大城市走在经济发展的前端，最先接触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能够紧跟或超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也能让人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

另外，更重要的是，大城市拥有很高的创业成功率，创业空问广阔。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城市，大量的企事业单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当今社会专业化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企业不是多面手，它的运作需要多个行业的配合，这时，有能力、有特长、专业化能力强的大学生可以在一段时间的磨练后，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自己的事业，成立自己的公司、个人工作室，或者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以不同的创业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就算大学生是农村所急需的人才，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下，也很难保证大学生有合适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因为越落后的地方，越小的地方，人的观念越落后，在用人上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的不良现象，人与人的背景复杂，裙带关产重。这些人已经形成一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愿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的位置让出。而让大学生干初中生都能干活，甚至连小学生都能干的活，这样大学生下基层岂不变成了好看不中用的一个“花瓶”？

这样的空间和环境决定了大学生的有限发展空间。这也是对人才的高消费、对知识的不尊重、对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当然，大学生在基层，并不是全无发展，自然有它的好处。去大城市的中心思想就是进步，只有在最尖端的地方才会有更大的进步，才会有更好的资源。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每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大城市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就业空间都有更大的优势；大城市的竞争更激烈，有血性有拼劲的人更适合在大城市拼搏；就理论上而言，在大城市就业安家，更有利于后代的学习环境优势。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选择大城市作为就业城市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大城市中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可以借此来进一步得到提升。大学大多都在较发达的大城市，所以当你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是回到家乡的小城市，就更有就业的机会与机遇。

以上我阐述的这些，并不是要声张大学生进入大城市就业创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在这里只是对当下大学生就业主要方向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其带来的一大结果也是这份报告所讨论的——当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局面。可能有人会说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与教育资源没有直接关联，但是据调查显示，全国应届毕业生约909万，其中师范生达74万，地方师范院校师范毕业生占比达97%。而且当今师范类院校的就读政策以及毕业定向工作等政策都很吸引高中毕业生去报考，当下师范类院校排名靠前的也不少，比如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除此之外，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也是“双一流”的重点建设高校。所以大学生中优质的教育资源数量还是非常可观，不可而忽视的，在探究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时不可忽略这一点。

以上，我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人群收入差距、经济实力不均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经济发展重心带来的教育取向性发展这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以人口和地区这两个维度进行了对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进行了全面阐释。在阐释过程中，可能有所遗漏之处还请见谅，但是每一个原因的阐述都引用了相关有效数据调查或者专业学术论文观点，所以关于经济原因的调查还算比较全面。经济虽然是最基础的方面，但我也只是单纯从经济这一体系进行挖掘，除此之外，由经济为基础带来的政策原因，制度原因，或者是从主观角度出发的个人观念原因也会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政策原因

 （1）近代中国办学理念和初期教育布局

 政策对于教育发展带来的择优而取的导向是基于现实的资源分配的。而资源本也是不均衡的积累的产物，不断究其源头便没完没了了，所以我姑且以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的办学沿革作为分析的起点。对于教育发展来说，社会是一个答案，文化是一个答案，历史则是另一个答案。应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世界交流沟通大势的冲击和中国对鸦片的应战促成了我国新式教育的起点。它以其在任何社会中都承载着希望，同时也承载着压力和挑战的特性，迎来了几千年首次的大改造，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们出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无法去渴望构建一个完美主义的教育范式。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仅是在军事上打击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和文化上沉重打击了中国的自信,后者远比前者更为严重。军事上主要是技术和组织的问题,是可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的,但对文

化自信的打击则更为严重和持久。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泱泱大国的文化优势心理根深蒂固,但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一次次沉重地打击,最终导致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尊严和自信。在这种严重局面下,清末实施了一系列变革,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不管成功或者失败,这都是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挑战的一系列应战。面对西方的强势挑战,在教育领域,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痛苦而艰巨的应战。

我们所熟知的洋务运动，西学渐入就是这个时期有着急救性质的应战措施。许多的新式学堂由此诞生。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武汉湖北武备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等等。与民国时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两大军校从政治战术入手不同,早期的军事学堂主要从工程技术入手。此外,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学堂,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四川中西学堂、湖南时务学堂、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等等。此外,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学堂,这一时期为主要教授外语和宗教及其他西学的书院,如山东的广文书院、武汉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苏州的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和南京的汇文书院等等。同时,中国的近代书院也开始创教西学。以上这些都是学堂。这之后还有以甲午惨败为引子兴起的办学热潮。由变法之声促成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生，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综合大学，其他还有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到后来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主要大学。

同时期的还有大批的留学教育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官派留学的最初目的，从最初派遣留美幼童到向欧洲派留学生等都是出于办洋务的需要。选派条件是针对所选派的留学生而言的，总体看来，政府在洋务留学时期选拔要求较为严格但尚未规范化。挑选幼童出洋，为中国首创之举。挑选什么样的人出国留学，则成为奕诉、曾国藩等人最关注的问题。洋务时期的留学绝大多数属于公费留学，政府对留学生的选派要求甚为严格，但由于这一时期还处于派遣留学生的初期，政府尚未有经验可循，再加上社会对西学的认识程度普遍不高，生源主要来自东南沿海比较开放的地区。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教育起步（我姑且将旧科举制看做一个教育阶段的终末）的参差了。以上的学堂和大学基本都分布在东部，还有中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这的确是无可非议的选择，毕竟本来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是历史的必然。京津地区、浙江、福建、上海、广东等，这些都是吃尽沿海发展或者政治历史红利的地区。有相对优质的人才资源和完整的产业系统，可以说即使不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也是唯一的选择。在后来中国近代大学的定型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认为，当时的中国，能举一国之力办好一所北京大学就已经不错了，但谁知高等教育的发展出乎他的想象，各省办学的热情和能力都相当惊人，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又是拉开差距的一次“机会”，国家的中心是先培养好这座在首都的大学，因此那些相较之下欠发达的地区得不到一定的援助，无法支撑办学的相应费用，这一点拉开了大区域间的差距。在同一较发达地区的人也不一定都有能上学的家境，因此小区域间的差距也被拉开。

民国时一个是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时期，后面是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时期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无路可退。但是中国教育同样出色地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性贡献，这里先不作进一步阐述了。

（2）新中国后的教育规划

新中国建国初,最困难的在于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面对中国自清朝末年开始的近四十年的分裂和混乱,国家需要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提升科学技术水平,重新建构社会道德,三者都需要重建中囯教育。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如何应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并保持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的快速培养,如何应对当时的普遍性的大规模学校建设，如何培养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自信。这每一项都是极为艰难的挑战。

 可以说中国教育在此时期极为艰难,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和精神高度,实现了一系列的应战。其一是快速地实现学校教育的正规化,普及中小学教育。其二是全国学校教育学习前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建构了前苏联模式的育教学模式。其三是为了快速培养各行业亟需的专业人才,中国教育采用了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开办了大量中等专业学校,在短时期内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其四是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统一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大力强化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并一直延续至今,促使中国社会在思维和道德上,有着明显的同质性,这一点确保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五是翻译了大量前苏联的相关教材,并编写了中国自己第一次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系列教材,为中国学校教育内容的体系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六是向前苏联和东欧等国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学习相关科技和教育,为新中囯的科技发展和人才建设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的应战是成功的。在建国初的短时期,新中国建构了自己的教育内容体系、学校体系和道德体系,并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教育模式,结束了中国教育几十年的混乱局面,开始了教育正规化。可以说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是中国对新教育所做出的第一次平衡。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由于种种家庭背景和观念的原因，能上学的孩子只占部分，同时中途辍学的也不在少数。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面对的时局更为严峻。西方社会经历了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十年，而在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具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科技有巨大的差距，导致对中国社会会的部分传统都产生了怀疑。，对中国文化部分失去自信，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进一步加深；道德高地失守。如果说清朝末年中国道德领域仍然自信，建国初道德自信和精神建设都非常优秀,那么改革开放初则是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自卑;西方文化和消费主义在进一步侵蚀中国。

面对这一些列的严峻挑战，中国社会和教育都做出了相应的应战。主要目的就是尽快赶上西方，弥补经济和科技的巨大差距。这种战略引导下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国民知识水平的齐头并进，而是部分人才的培养，优中选优。中国重新建构了学校教育体系，将文革中被混乱化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重新引上正规，并历史性恢复了中国高考。并且重新审视西方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并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在高水平知识分子的培养上，采取了重点学校模式，设置重点学校，设置985和211工程学校，要产出精英人才。这就成了教育不公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高考一直实行的是分省配额、划线录取的办法。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各重点大学在招生名额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基本上由各高校自行制定招生方案，报教育部汇总调整后转发各省招办，按“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体制进行录取。各重点大学有较大权限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其好处是充分调动了学校的积极性，获得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其弊端是各高校招生名额向发达地区即重点高校所在地区过度投放，严重影响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造成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愈拉愈大的局面，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指责，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造成了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考生激烈的升学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应试之风日盛，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以清华大学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市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200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市投放360人，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投放指标308人，清华、北大两校在其他省、市、自治区投放均不足100人，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70%，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录取率和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农村地区少地方低，有的甚至会有100多分的差距。见下表：

|  |  |  |
| --- | --- | --- |
| 批  次 | 安   徽 | 北   京 |
| 一  本 | 538（理 工）520（文 史） | 488（理 工）454（文 史） |
| 二  本 | 476（理 工）480（文 史） | 443（理 工）429（文 史） |

上表是2005年北京和安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其中的差距十分明显。本来城乡教育的起点就很不平等了，这样以来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就进一步的被人为的拉大。据报道，部分地区还有过金融高管子女入学优惠政策，此举让人费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以来奋力疾呼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在大区块上并没有得到实现。同样的大学同样的专业在不同的省份所需要排到的比例甚至可能近十倍之差。可能有人会说本来两个地方相同排名比例的人学力就不同，但这正是证明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某些全国重点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重点大学”。

从溯源来说，九年义务教育是从1986年开始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2006年才通过的。可以说现在这一块我们国家做的还是很好的。大部分镇里的甚至村里的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都是齐全的，包括多媒体。可当时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政策做的并不彻底。  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由各级政府负责，免收学费，但可以收取适当杂费。但是各地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乱收费现象，包括基层政府、有关部门或单位通过学校向学生搭车收取各种名目费用，或向在校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摊派等，人为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这种现象在相对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

（3）城乡二元与一体的两难

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部,另一个是以传统方法为基础的农业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占社会产业结构的主体地位,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短时间内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国家给予了明显的政策扶持,至此,农村资源被大量攫取。农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农副产品,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土地、资金、廉价劳动力最初也来自于农村地区。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产生的。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也被视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但教育总体上还是依附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的出现,导致城乡二元形态的出现,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应地教育领域内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现象。

城乡一体化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在2020年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这个方针列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之首。对于城乡一体化，不同学科对其的界定不同。

教育城乡一体化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教育资源高度共享,城乡教育公平、协调发展,城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最后实现城乡教育完全融合。马克思认为“城乡分离”、“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但是发展过程是漫长的,因为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至今,人类都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国的农业文化源远流长,而且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仍然有农村的存在,也间接地说明了绝对地城乡一体化这一愿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教育城乡一体化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人们追求教育公平的一种诉求,也是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现实体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被广泛地提倡、大力地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被认为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归宿,几乎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现实情况是,过度地提倡城市价值导向,使农村教育出现主体性缺失的情况,农村教育以模仿城市办学模式为主,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所有学校都走城市化办学道路是无法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的。

城乡教育一体化,并不是农村教育绝对的城市化,但是目前,普遍认为把农村教育办得像城市教育一样就是成功的教育,所以农村教育也以培养城市精英为目标,课程内容城市化元素、城市符号居多,教学方式也大范围地提倡多媒体教学,而且有些教学内容必须运用到多媒体操作,并没有切实地考虑农村的教学情况,也忽视了农村教育的本来组成和优势成分,一味地摒弃农村教育原有的东西而不自知,反而觉得这是教育公平的体现。而且在教育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教育评价也是参照城市的教育评价系统,精英阶层制定出来的规则必有利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制定的评价系统很难使得非精英阶层向上流动,教育资源只能在阶层内流动，并没有起到推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先讲一下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弊病。在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下,形成了强大的“内卷化研究范式”用来解释那种“有増长无发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习俗与习惯的精致固化”等现象首先,信息闭塞,资源共享程度低。城乡二元结构最直接的表现是城乡双轨并行,两者只进行内部资源共享,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较少,但是因为城市信息技术发达、交通便利,城市学校能快速获取最新的教育资讯。而且,一些教育理念、教育改革就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他们有最终的解释权。

除此之外,城乡教师配置也极为不均衡。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一句话，从观念上解释了为什么农村的教师要跑到城里去：“为什么他们(县城学校)老师来就叫作‘帮扶’,而我们去他们那里就叫‘学习’？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叫支教,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就叫借调或交流？为什么他们有一年支教经历就能升职称,而我们有一年借调经历却什么都不算？”。教师合理流动是社会现象,但是农村优质教师不合理流失却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农村贫困文化遗传,暂时贫困变成代际贫困。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因。虽然刘易斯贫困文化代际遗传的观点存在争议,但其论证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而且习近平也提出扶贫必扶智,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目前而言,教育几乎是盆苦阶层向上层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教育城乡二元对立很有可能切断这条路径,不仅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接下来再讲讲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弊病。城乡一体化实则变成了农村教育城市化,城市与农村分别是先进与落后的代表,城市教育是需要学习的,农村成分是需要摈弃的。其实,对于农村教育来说,教育表现为一种符号暴力。在整个社会当中,城市人作为内局群体把持着文化表达,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公共舆论具有主导作用;而农村人作为外局群体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他们无法触及和影响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只能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农村教育边缘化的地位被虚假平等所掩盖,城乡教育显性二元结构逐渐瓦解,城乡一体化背景下隐性二元结构产生。首先,农村教育办学产生城市路径依赖。农村教育以九年义务教育以及部分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一般情况下,两者都以城市学校的办学模式、改革路径为参照蓝本,农村学校缺乏独立的思考与自我规划。变革主体缺失、内驱力不足长期的外铄式增长,阻碍了农村教育真正有效的内涵式发展。

借鉴与照搬是有区别的,对于城市成功的办学经验是要进行学习、借鉴,但是毫无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合理的自我定位不了解自己学校的优势与短板,一味地追求先进的教育理念,学习成功的办学模式,不能做到自我消化,这也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照搬。其次,绝对的平均主义,教育资源无法产生最大化的效益。

到这里，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以所谓“空间正义的角度”去看待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他先说空间正义是指“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与侧重于关注社会资源在“器皿”般的空间中的配置是否正义的“分配正义”相比,空间正义“不仅考察和批判了各种形式的空间分配不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对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不正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不对等的待遇、人的空间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资本等要素在参与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是否造成或者加剧了空间的失衡等问题。

从空间正义的角度来看，现在所进行的推进教育平均的举措不过是教学物资的普及化，但是教育资源的生产在城乡之间根本不对等。也就是说，乡间教育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不管是物资还是教育理念。它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去享有教育发展的权利，只是在一味地收到教育资源的补偿。因而农村教育内动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公平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追求但是公平不等于平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平是相对的,绝对的平均是一种低水平的公平,这也是简化处理的表现。绝对的公平会导致农村办学惰性思维的产生,教育资源产生的效益无法实现最大化,教育资源隐性浪费的情况将会产生。最后，隐性二元结构产生,虚假的平等阻碍了思维的觉醒。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因为文化资本累积数量与质量的差异,精英往往产生于精英阶层内部,而不是通过非精英阶层的向上流动产生。城乡一体化实则是农村教育城市化、在“城市价值”导向下,城市文化被视为主流文化,农村以为城市输送人才为教育目标,课程内容城市元素较多,教育信息城市内部共享的速度远远超过城乡共享的速度,当前的教育评价也是有利于城市精英阶层的。虚假的平等掩盖了城乡教育隐性二元化的产生,农村教育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品。

## 3.观念原因

## 1）各地区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 a.教育理念分析

教育理念，即关于教育方法的观念，是教育主体在教学实践及教育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应然”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使命、教育目的、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教育要求、教育原则等内容。

查国内极具权威性的由[董纯才](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3%E7%BA%AF%E6%89%8D%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年版），[李冀](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6%80%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主编的《[教育](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管理辞典》（1989年版），[顾明远](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E%E6%98%8E%E8%BF%9C%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主编的《教育大辞典》（1990年版），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8D%E5%88%97%E9%A2%A0%E7%99%BE%E7%A7%91%E5%85%A8%E4%B9%A6%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1993年版），均不见“教育理念”之辞条。尽管我们还处在对“教育理念”尚无明晰定义的阶段，但这并未妨碍人们对“教育理念”一词的频繁使用，由此说明“教育理念”已被教育界内外广泛认同。考察那些公开使用“教育理念”概念甚至连论题都冠以“教育理念”的文论（这类著作、论文不是少数），我们有这样的发现：多数作者在“教育理念”的使用中，回避了对这个概念本身作必要的说明和界定。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有相当多的作者视“教育理念”如同“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一样，当作成熟概念使用，自然不必解释；其二，“教育理念”确实是个与不少教育基本概念含义相近、性质相似但又不完全相近和相似的复杂概念，其内涵边界的不确定性，导致其似乎是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因此，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然而正是我们缺乏对“教育理念”基本内涵的讨论并且没有准确地理解其涵义，故也就很难避免“教育理念”的泛用甚而滥用。如有些著述把一些反映或揭示教育或教学活动特征、教育主客体属性特征的概念也视为教育理念之种种，有些人甚至把教育发展出现的一些趋势特征，如国际化、法制化、产业化、大众化等等也都纳入教育理念范畴，仿佛教育理念是个无所不装的百宝箱。澄清对“教育理念”的模糊认识，只有老老实实讨论这个概念。

## 社会层的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 a.社会教育理念差异体现

教育是改变人、培养人、奠定人终生发展所需基础的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尤其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理念是系统工程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部的一些教育大省，并未发展成为今日的教育强省，致使西部教育和东部教育的差距非但未能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步缩短，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呈越来越大的趋势教育理念的差异是西部教育落后于东部教育最根本的原因。

理念不是装点校园的口号。有人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愚昧，比愚昧更可怕的是虚假。东西部的“手拉手”结对子教育扶贫早已有之。其表现形式，一是代培学生。许多与西部结了对子的东部学校都在代培西部学校的一些优秀的贫困生。二是教师的往来。或邀请西部教师去东部参观考察;或邀请东部教师传经送宝，有些甚至聘请来校任教。

然而，在这样的交流形式中极少有人能将别人的先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最常见的是将别人的理念变成口号式的标语来装点自己的校园。从形式上看很时髦，也挺有时代感，但说起来就不知其所以然了，做起来只能是茫茫然。那些大而空、虚而假的行政机关式的校训就更难体现学校教育教学的特色，更不必说能适应本校办学思路和特色的理念了。

学生是理念的终极目标。“教育就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真理，不断砥砺崇高人格。”这是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首批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重点中学南师大附中的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升学率不等于合格率，升学率不等于成才率”的口号，并且把自己的人才目标定位于“轻负担，高质量，高分高能，德好体强”。在西部的许多学校，虽然也在强调“狠抓素质教育，提高办学质量”。但令人遗憾的是，“素质”早已成为子虚乌有的幌子，“质量”就是学生的升学率与分数排名。因此，许多学校为了“提高质量”，在高三将成绩差的学生挂在自己的民办学校和第二梯队来考试，甚至干脆剥夺学生的考试权，将高三和初三的差生劝退或变相转学;相反，对一些成绩较好但考重点和名牌仍有困难的优生，在毕业档案中弄假三好、假优秀学生干部、假国家二级运动员等荣誉，以求升学率。

各校之间也在竟相挖掘自己的“亮点”，你是总分第一，他是主科第一，我是升重点的第一，省线的第一。从未有哪一所学校在争夺收取差生、关心差生或转化差生的人数和效果上的第一名。这样的分数观和质量观与东部许多名校的观念恰恰相反。东部某三连冠重点中学的校长曾在全校的教职工大会上说:“我们学校是连续几届的状元学校，但状元绝不是高三某些教师的专利，状元的培养也绝不是单纯的考试成绩第一，应该是全体教师全面培养的共同成果。”可以这样说，在西部，招生时不惜一切代价搞生源大战，周六各种名目的强化训练补课，高三各种各样的题海战术，虽然也练出了一些解题的技巧，但失去的却是学生研究型学习、释放心灵、探求自然、合作实践的智慧和个性发展以及健全人格的魅力。在这点上，锡山高级中学有“不准星期六给学生留作业，不准老师给学生发整套的练习资料”的做法，很值得西部借鉴，因为在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下，学生的培养方式与最终的受益程度是大不相同的。

理念是教育评价的指南针。教育评价对教育教学的督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谁又能对教育评价进行再评价呢?恐怕惟有理念能担此重任。目前，东西部教育评价的最大差距就在于东部一些教育强省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地区教育发展规律的人文评价手段了，他们能正确地处理升学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西部的绝大部分学校或名校至今仍然死守量化考核与末位淘汰的教条不放松。其中的秘密就仕于数子的有佣叮以掩而理心的快糊，末位的淘汰又可以减少管理过程评价中遇到的的许多麻烦，又可以遮掩人性的虚无。单说习惯养成与思想道德教育的评价，所谓的重点学校大概都少不了量化考核标准与扣分的原则办法。但校园之外学生的一些恶习和陋俗毫无遮拦地表现出来以后，我们的量化却进入了一片盲区甚至禁区。

### B.差异导致对教育资源的投资存在差异

不同地区的教育观念不同，导致政府和企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从而在教育投资上面存在差异，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我国教育投资现状：眼下国内“市场无热点”，“消费无热点”，唯独教育是例外，诸多家庭把子女接受教育放在首位，教育支出是当前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据有关统计显示，在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教育支出递增达30%，发达地区达到45%。上海市民1998年的教育支出仅次于基本生活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25%。这种个人教育支出递增的趋势已由国内的大中城市向小城镇扩展，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扩展，教育投资已成为我国城镇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

全社会教育投资意识的增强，一方面可以改变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促进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个人教育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带动经济的增长。

从教育投资比率来看，我国政府现有教育投资占财政预算的7.5%，这一比例大大低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水平。早在1975～~1995年间，日本政府每年支出的教育费用大体占总行政费用的20%。从教育收入的比率来看，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27%,远不及发展中国家的40%~50%的水平。

此外，从教育投资的增长来看，据统计，自1979年以来，我国政府教育经费年均递增16%，如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实际增长甚微，即使在近年提出“科教兴国”的大气候下，教育投资实际上并未明显提高，甚至有的年份为负增长。

教育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教育投资总量是非常有必要的。下表是我国从1992年到2008年[教育经费](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BB%8F%E8%B4%B9/10945863%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的增长情况，由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经费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有了稳步地增长。从总量上来看，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67.0亿元，到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4500.7亿元。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以当年价格计算）是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以当年价格计算）的16.73倍。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教育事业投入的重要指标。教育经费得到了大幅度地增长，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22%增长到了2008年的4.82%。通过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来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经费总量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很快，但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以前处于下降状态，到1994年以后才慢慢稳中上升。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6%95%99%E5%85%B4%E5%9B%BD%E6%88%98%E7%95%A5/3072017%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可以推断这样的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教育投资的增长趋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首先，人们的[教育需求](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9%9C%80%E6%B1%82/9296221%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进而促进了教育投资的增长；其次，[国家经济](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BB%8F%E6%B5%8E/4147005%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的不断增长，也为教育投资的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

另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差异显著，教育投资的地区差距较大。教育方面的差距不仅体现教育规模、结构和条件上，也体现生均教育经费上。[经济发展水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5%8F%91%E5%B1%95%E6%B0%B4%E5%B9%B3/10173878%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比较高的东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BB%8F%E8%B4%B9/10945863%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8A%95%E8%B5%84/_blank)也比较高，但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较低。在经济发展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投资又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继续拉大，这样的趋势不利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不同家庭的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 a.家庭教育理念差异体现

教育是实现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教育几乎是改变个体及其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教育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学校、教师以及学生，而且包括家庭。其中，家庭的教育观念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决定了家庭资源向子代教育倾斜的程度。家庭的教育观念主要是指父母是否重视子代的教育，进而是否愿意在子代教育上全力投入。既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入来衡量父母的教育观念，并且认为家庭教育投入不仅包括父母对子代教育的经济投入，还包括时间投入和情感投入等多个层面。一般情况下，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较多，就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反之，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较少，则说明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

围绕家庭的教育投入，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家庭教育投入的特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家庭教育投入的城乡差异、家庭教育投入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其中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构成学界研究的重点。具体而言，既有研究认为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变量。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明显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 第二，父母的个人特 征，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的价值观等。例如，河北农村地区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以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生存经济条件下，父母的劳动参与程度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家长不正确的价值观（如安土宿命观、功利主义观）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三，家庭的教育投入还取决于对教育投资行为的理性分析。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衡量是家庭教育投资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时候，父母会更加关注教育投资带来的教育收益。如果教育收益较大，父母就可能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反之，如果教育收益较少，就可能弱化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动力，进而压缩家庭的教育投资。此外，还有学者对比了家庭教育投入的城乡差异，认为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总体上高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具有“高教育期望 ＋高课外补习支出 ＋互动式参与”的特点，而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具有“高教育期望 ＋低课外补习支出 ＋ 单向式参与”的特点。另有学者进一步从心理学的视角解释教育投入的城乡差异，认为城乡父母在受教育水平、生活方式和亲子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其对子代教育投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农民教育观念分化的经验呈现：江浙地区农村和西南地区农村具有不同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具有较大差异，在此背景下，两个地区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江浙地区农村和西南地区农村农民教育观念的差异不仅体现在60后和70后一代人，而且在80后和90后年青一代父母身上也体现得颇为明显。总体而言,江浙地区农民家庭比西南地区农民家庭更加重视子代的教育，对子代的教育期望也更高。根据笔者在江浙地区农村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地农民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农民家庭普遍非常重视教育。这些地区出生于20世纪80年之后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相对于西南地区农村的同龄人更高，80后和90后大多具有专科以上文凭，初高中阶段学生辍学的情况极少。二是不会刻意追求上名校，大部分农民家庭的子女上的是比较普通的大学，其中上大专的比例尤其高。

与之相比，西南地区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农民家庭普遍不是很重视子代的教育，大多数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持“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子代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与小孩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程度有关，与父母和家庭的教育投入没有直接关联。这些地区的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通常都不强求，也不过度介入，大多数时候都遵从子女自己的意见。例如,在是否要报培训班或补习班方面，父母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愿意就报，不愿意就不报。二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呈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投入和培养。父母对子女教育上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子女的教育潜力，如果子女在小学阶段就表现出成绩优异，父母就会认为这个小孩是读书的料，在其教育上愿意投入和付出更多。反之，如果子女在小学阶段成绩很普通或很差，父母就会认为这个小孩天生不是读书的料，不论怎么培养都不会有太大改变，父母在心理上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子女的培养，因此不会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家庭普遍认为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子代及其家庭的命运，因此一旦子女学习成绩优秀，父母会倾尽全力培养。因此，笔者在西南地区农村调研发现，只要是有子女上大学的家庭，一般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学，上大专或中专的相对较少，在这些地区的农民看来，上专科或者技校都不算是上大学。

分析框架:家庭策略的视角

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对子代的教育投入须立足于家庭再生产的总体状况统筹考量，农民教育观念因而服从于其家庭再生产需要。农民的教育观是朴素的、经验的、情境性的，是在家庭策略的实践中塑造的。家庭策略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家庭策略是家庭基于其资源禀赋以及所处的客观环境条件所做出的一种理性抉择。家庭策略这一概念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且这一概念并非强调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是从家庭整体的视角出发，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的实践逻辑。

家庭策略是在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展开的，是农民家庭根据其现实状况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农民家庭策略安排受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的双重影响。首先，家庭策略的安排和选择取决于家庭的资源禀赋，这是家庭策略展开的基础。在不同的家庭资源禀赋条件下，农民家庭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一般而言，家庭资源禀赋越强，家庭策略的空间和可选择性越大;家庭资源禀赋越弱，家庭策略的空间和可选择性就越小。其次，家庭策略的安排还取决于家庭目标。根据农民对家庭目标定位的不同，可将家庭目标划分为维持型目标和发展型目标两种类型，维持型目标以完成家庭继替和家庭延续为主要任务，其核心任务是完成传宗接代和过好当下的家庭生活;而发展型目标则不仅要完成家庭继替和家庭延续，而且还要尽可能实现家庭发展和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家庭目标的定位决定了家庭的资源配置逻辑，进而影响了家庭策略的安排。具体到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上，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是影响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关键要素，其中，家庭资源禀赋奠定了家庭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能力的大小，而家庭目标的定位则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动力的强弱。基于此，本文将以家庭策略为基本分析视角，从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逻辑及其区域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本文认为家庭策略塑造了家庭教育观念，且家庭策略主要是通过家庭资源和家庭目标二者具体影响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对于农民家庭再生产而言，子代教育是一种可选择的投人，即农民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具有较大的弹性选择空间，既可以选择多投入，也可以选择少投入，而每个家庭具体如何认识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如何投入则受其家庭目标和家庭资源的影响。换言之，只有在家庭策略的实践逻辑中，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才是可理解和可把握的，才能超越对于教育观念的抽象化理解。

### b.差异导致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存在差异

教育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农民的教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再生产的方向和重心。总体而言，江浙地区农村由于其本地市场的区位优势，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很强,家庭资源禀赋较多，发展导向的家庭目标又使得农民家庭具有很强的发展动力，农民家庭对子代教育普遍很重视，在子代教育上的投入较多。相对而言，西南地区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有限，家庭目标的维持型导向又将大部分家庭资源聚焦于当下家庭生活和子代的婚姻大事上，因此农民家庭对子代教育普遍不是很重视，在子代教育上是有选择性地投人。由此可见，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并非天然有之，而是由特定的家庭策略形塑而成。家庭资源禀赋的强弱奠定了农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而家庭目标的不同定位则塑造了强弱有别的教育投入动力。不同地区因区位条件的差异，农民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农民教育观念的差异。

家庭教育观念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它是农民家庭基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经济基础等做出的主动选择。但是，从家庭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在当前阶段仍然是实现家庭发展和家庭流动的主要途径。在此意义上，越是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越可能通过教育改变子女的命运并实现家庭的阶层流动，反之则可能陷入简单家庭再生产的循环。在代际更替和代际接力过程中，子代的人力资本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教育是农民家庭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子代的人力资本状态主要取决于家庭资源向子代教育倾斜和投入的程度，不同的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农民家庭在子代教育上的差异化投入，最终会反馈到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形塑不同的家庭发展能力。因此，教育是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进而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家庭发展能力是衡量一个家庭发展的关键变量。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而且取决于家庭的资源配置能力。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劳动力质量以及家庭所处的市场区位条件等要素相关，而家庭的资源配置能力主要与家庭目标的定位有关。一般而言，如果农民家庭将资源更多用于子代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从长期看将更有利于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家庭发展和家庭的阶层流动奠定基础;如果农民家庭将资源更多用于当下日常生活和子代婚姻等目标上，家庭再生产往往则只能维持简单再循环，家庭发展能力较低，难以实现家庭发展与家庭流动。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对子女教育的过度重视和过度投人可能导致一些家庭陷人“内卷”，从而扰乱农民家庭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家庭秩序。基于此，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农民家庭树立正确和理性的教育观，引导农民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对于农民家庭发展和乡村振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的教育观进行适度引导，从而为底层家庭走出困境提供一条可行路径。首先，要引导农民家庭重视子女教育。要让农民认识到，教育是改变自身及其家庭命运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山区农村，“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很盛行，要通过相应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观念引导，让农民认识到教育的好处和意义，这是帮助农民脱贫的根本路径。其次，国家要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来分担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压力和负担,避免让农民家庭承担过多的教育责任，尤其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家庭承担一定的教育责任本身无可厚非，但学校和教师也不能将过多的教育责任推卸给家庭，因此，既要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也要让教师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避免因为家庭经济能力较弱或父母教育观念不强影响子女的教育。最后，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家庭合理进行教育投资，避免农民家庭过度卷入教育竞争之中。

#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均带来的影响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的前提条件下，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对于促进我国高级人才的培养，促进部分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曾起过较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向高层次迈进，对整体国民素质要求的提高，这种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人们受教育的不公平严重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

## （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盲目“军备竞赛”

根据甘露泽雨乡村教育振兴实践团于广西河池当地开展的线下调研成果，我们得知由于教育资源分配失衡，职业薪酬差距过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式下，在当前人们普遍认知形式下，高学历代表着未来的职业高薪酬，而高薪酬又代表了存款下限提高，而存款下限提高代表了孩子未来的房车水平乃至更优秀的妻子。在此认知前提下，家长们往往倾向于利用现有资金投入教育，试图通过金钱弥补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缺额甚至反超教育资源充足地区教育水平。

然而这种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的“军备竞赛”往往是弊大于利的。皮亚杰提醒我们，思维开端与动作，但是思维结构的精细化和高级的运算结构得益于语言，而语言能力的丰富和发展不是刻板课堂教出来的，必然是儿童在充分扩大其社会交往，特别是与同伴的交谈和讨论中熏陶而成的。很多家长把孩子的日程塞得满满当当，自以为是在加速孩子的智力开发，有利于孩子在同等水平的竞争下产生巨大的优势，其实恰恰可能丢失了更为宝贵的一个方面。古人有“为学日增，为道日损”的告诫，我们固然不必将其极端化解读，但一味注重智育而忽视德、体、美、劳的教训，比比皆是。

例如让一位五岁的小孩子，在还没有形成符号观念和数的概念下的情况下，一定要让他去理解一些数学逻辑；这种还处于皮亚杰所说的“前运算思维”或“自我中心”的状态下的小孩子，非要让他做到跳出“第一视角”、开启上帝视角，通过大脑计算洞悉几何图形的变换转型。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然而在家长陷入“军备竞赛”下的狂欢时，往往难以察觉、又或者是根本不关心孩子的认知水平是否能够让孩子无障碍学习这些知识。

然而这种盲目的“军备竞赛”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带来的。曾经在网络上传播过一个段子：“楼主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这个段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北京城六区教育的残酷性。在外人看来，北京高考相当容易，但在北京城六区家长这里，则是不断努力，从小便要抓起的漫漫长路，尤其是在一本率较低的城六区以外的北京。

在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的人大附中学子之间流传着一个段子：“高中不努力，毕业去隔壁”，也就是说在他们心中最差的选择也就是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类似的事情在上海也出现过，被全国唯二的985师范大学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华二附中的学生们，也觉得最差的结局是考华东师范大学。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现实——绝大多数人眼中奋斗许多年才可能实现的目标，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起跑线罢了。当然进入类似于人大附中这样的明星高中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全市最顶尖的优秀学子都会被这种明星高校收入囊中并且用全市甚至全省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一个个人中龙凤，而其他高中的学子可能并没有名校学子那么聪慧再加上得不到充分的教育资源倾斜，考上好大学的概率非常低。为了孩子们能上明星高中，那么孩子就必须要上明星初中、明星小学乃至明星幼儿园。于是“军备竞赛”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放松。

如此“军备竞赛”也许能够促进一些教育补习产业的飞速增长，提升部分城市GDP，但这对家庭的经济负担以及孩子的心理压力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在疫情时代下的影响加剧

在中国现有经济体制之下，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户籍、收入分配水平、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异逐渐缩小，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依然很明显。

我们先刨除疫情因素比较教育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的差距：2016年我国有小学在校生9,913万人，城区、镇区、乡村小学的在校生占比分别为33.0%、37.9%和29.2%；有初中在校生4,329万人，城区、镇区、乡村的初中在校生占比分别为34.4%、50.2%和15.4%，与小学阶段相比，初中阶段乡村学校在校生的比例明显降低，而镇区初中在校生的比例有相应的增加。同年，高中在校生有2,367万人，其中乡村高中的在校生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了3.2%，而城区高中的在校生占比提高到了47.0%。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大约有一半学生在城区的高中就读，一半学生在镇区的高中就读。我们考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按照我国分级办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县镇一级办高中，所以本身乡村的高中就很少，所以农村的初中毕业生要升入普通高中的话，都入读了镇区或城区的高中。第二个原因就是高中升学率还是城区和镇区要高于乡村。

在普通高中阶段，专任教师的90%是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比例城区学校略高于镇区学校，但整体来看差异是最小的。在初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专任教师中大学专科毕业生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分别占比10%、20%、24%。在小学阶段，城乡间差异进一步扩大。乡村小学的专任教师中有11%是高中阶段毕业或高中阶段毕业以下，42%是大学专科毕业，37%是大学本科毕业。镇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46%和48%；城区小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30%和66%。总之，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学校专任教师的学历构成城区学校高于镇区学校，镇区学校高于乡村学校这一不均衡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

此外生师比一直是衡量教育资源投入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可见，在普通高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师生比分别为13.0、14.3和13.7；在初中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生师比分别为12.8、12.6和11.0，城乡间差异都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小学阶段，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生师比分别为18.8、18.1和14.6，城镇学校的生师比明显高于乡村学校。这也许是由于乡村小村一般规模都比较小，致使教师资源不能达到高效率的配置。也许是由于乡村小学的教师中专任教师的比例比较低。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我们可知每万人拥有教学用电脑在城区无论在普通高中阶段（2093.6）、初中阶段（1622.7）还是小学阶段（1065.1）都比在乡村（分别为1894.7、1559.9、956.4）的数目多。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每万人拥有的多媒体教室数目以及每万人拥有的图书数目。

在乡村硬件设施数目及质量普遍落后于城市的情况下，随着疫情侵扰导致的线上教学对硬件设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在乡村之中很难普及每家一台标准的教学用电脑，而在城镇中，每家一台标准教学用电脑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于是在乡村教育资源本就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乡村开展线上教学的困难重重，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带来的差距会更加明显，严重影响学生升学情况。

##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而影响人们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受的教育水平。在相同阶层类中，不同的职业位置和职业层次，与个体所拥有的教育和文凭资格证书有密切的联系。研究表示：“从年收入均值来看，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上者，主要是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三个职业阶层，即管理人员、高等技术人员、中层骨干人员。收入最低的是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年收入值不到6500元。”根据普遍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中、小学文化程度者居多。教育的“明瑟收益率”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给人们带来相应的经济收入增长，这个收益率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社会要求当今的劳动者更需要拥有高素质，高技术。教育是改变代际贫困的最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匀，不同地域、阶层、地位的孩子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差距很大，导致很多贫困家庭无法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育少，水平低将会导致经济收入降低，从而形成教育水平低、质量差和经济社会地位低之间的恶性循环。教育问题不仅成为了贫困家庭走出贫困的瓶颈，而且有可能成为贫困现象在贫困家庭中代际遗传的根源。

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匀不平等，人为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得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通过教育提高经济收入的难度增加，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大提高，社会合理流动通道严重不畅，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减弱，教育资源份额皮不公平导致的收入两极化发展有加剧的趋势。

## （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影响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培育的理想社会阶层结构形状是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因为它具有公平、效率高、稳定性强、易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优点。”目前我国总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呈金字塔式的，不是橄榄形，这种阶层结构极少数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下层，社会底层人数过多并且社会中层阶层人数较少，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少数人占有了社会中多数资源，而绝大多数人仅占有少数的资源，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的活力和劳动效率有限，社会公平性和稳定性较差。于是，要促进和谐社会合理的阶层结构，就要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特别是促进社会底层人员向中间阶层的合理流动，壮大中间阶层，造就“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所有促进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合理流动的要素中，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和最公平的机制。人们通过接受相应的教育，提高自身的劳动素质，用于谋求理想的职业，增加经济收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达到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而顺利地进入更高阶层的目的，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的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不均衡，拥有教育资源的多少、是否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接收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越来越依赖出生地、家长的社会关系、经济能力以及权力背景等个人无法左右的因素，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对于教育资源的享有往往缺乏选择性，他们往往智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被动接受较低水平的教育，社会合理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和城市重点中、小学，重点大学、高收入职业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处于社会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不仅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而且也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根源。

## （五）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匀会损害公众对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预期，更容易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教育凝结着社会对未来的期望，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发展的起点。在我国，教育更是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期望。中国父母有把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寄托于子女身上的传统，许多家庭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保证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期待教育能够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这种期望的实现过程往往不仅促使个人努力奋斗，使个人对未来，对社会充满期待，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稳定。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格局， 则注定许多人，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无论怎样努力，自身及其后代都只能被动接受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匀而带来的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所有改变命运的期望落空，他们在对自身失望的同时转而对社会失望，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现行正义体系怀疑，转而寻求不正当或不合法的途径来发泄不满、来改变自身的境遇。这种状况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人大代表李春玲说过：“如果让底层命中觉得没有任何希望、没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去犯罪、会仇富、会制造社会不稳定。”在一个相对良性、健康、有序运行的社会里，对于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人及其家庭来说，平等地接受教育应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该体现为金钱、物质、权利、地位的直接再分配。教育起点和机会的不公，实际上又会因为堵塞和改变了民众的正常社会流动而逐渐侵袭、腐蚀社会原有的正义体系和价值观念。它有损公众对社会发展的预期，从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以及健康发展。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即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不公平的映射，有不同于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将加速社会矛盾尖锐化，使得现有的社会不公平加剧并使其范围扩大。因此，确保教育公平，不仅仅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的需要，也是维护和确保社会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底线的一种保障。

## （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将会造成政府形象和作用的扭曲，触及社会公正底线

当前教育问题已经连续几年成为“两会”代表提案的热点，教育乱收费也曾连续三年位居消费者投诉排行榜的首位。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教育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如高收费、乱收费、“择校热”、“名校办民校”、教育腐败等都与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有关。我国现行教育政策、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则是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主要原因。政府作为教育政策、体制、机制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理所应当地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到位和偏向，引起教育不公平状态的普遍存在，致使公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收入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改变过多依赖于一些个体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出生、权利、金钱、社会关系等等，导致人们获取利益的机会与个人才能、主观努力、把握机会的能力背道而驰，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的价值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教育的各种情绪责难也往往直接指向政府部门，造成政府部门正面形象和作用的扭曲，影响社会稳定性，触及社会公平公正底线。教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其分配应该有别于其他商品，它的分配应充分地体现均衡性和社会公平性。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受益者虽然主要是个人，但它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各级政府应当在这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必须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让更多的人接收到良好的教育，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认真务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取信于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充分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保证人民群众有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重要内容和必要保证。当前，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已经对社会公平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虽然在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教育不均衡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必须把教育发展不平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尽可能缩小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政府应积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增进社会公平。

## （七）乡村教师受地域限制，对于本土的文化适应能力薄弱

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学校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显示，从东部到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呈明显的递减趋势。针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特别发生在乡村与城市之间。

新一代的乡村教师大都是城里来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他们毕业后进入农村工作，但受城市文化的熏陶，难以理解与适应乡村文化，也无心无力参与乡土文化的建设与继承。特别是各个自治区，我国对于教师的培养更倾向于强调社会主流文化知识，难以全面关照到师范生本民族文化，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本土的民族文化疏于了解，进而难以理解与适应民族文化。特别是因民族文化某处的冲突导致的教师对于课程的把握度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多数民族地区教师对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教学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合理的解决方法，对于发生在课堂上的文化冲突感到不知所措，进而导致事故多发[1]。

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局内人”“局外人”沟通困难，教育文化适应难度倍增。具有乡村文化底蕴以及具有对乡村生活适应能力的主体，会因为本身认知的偏差，会对并不了解本土乡村文化的“局外人”，即刚毕业或从城市来的的大学生，产生认知偏见，将其看成“没有真本事的平庸之辈”。而由于语言不同的问题，学生与教师之间存在沟通障碍这一致命问题，而且教师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出现难以适应的情况。根据我们甘露泽雨实践团历时十四天的社会实践切身调查发现，针对实践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的乡村，我们发现，对于外省而来的实践团成员，在进行实地采访与支教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难与当地人沟通，语言不通是个问题，主要还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导致的适应困难。特别是针对我们所处的民族自治区，因语言导致的文化认知位移必然会削弱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力和对乡村文化的适应力，进而阻碍教师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场域的惯习形成，最终影响其专业发展和职业认同度。若乡村教师剥离文化熏陶和文化体验，没有主动去研究和理解民族文化场域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其悬置与乡村文化上空。这样会直接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文化适应能力薄弱，影响民族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2]。

因此，对于乡村或者教育资源较弱的地区，如何承接本土文化的厚重性，对于教师而言，便成为了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大多教师无法把控与适应其文化的内涵，所导致学生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出现本土与所接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3]

## （八）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对于文化包容性存在差异

教育资源不均的地区文化包容短绌，对“新技术文化”的感应不足。本土教师大多局限于固有思维，对新事物的接受和新文化的适应缓慢，导致不能够熟练应用“新文化技术”。有学者在新疆的阿克苏地区沙雅县通过问卷调查、随堂听课、访谈发现，该地区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不高导致其应用力度不高、范围不广，大部分教师习惯于传统的单向授课，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积极。在我们走访广西河池市乡村学校时发现，本土大龄教师对于新业态、新科技、新思维的教学模式普遍难以适应，而非本土的青年乡村教师则对乡村本土的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保持一种理性心态，从而导致该地区“新科技文化”普及的局限与非本土青年教师“文化不解”的内外张力，进而导致在教育资源不均地区，甚至是民族自治地区，总体上呈现文化的包容短绌。

在实践团的支教过程中发现，实践团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的感受性并不强，对于民族文化只能停留在互联网上的知识中，相较于当地的小朋友，我们并不能像他们一样去切身体会当地的民族特色，从而导致在讲授民族文化课堂中出现同学们的兴致不高或者说讲解的内容是他们所熟悉的民族文化。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如何选取合适的民族文化内容”便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大问题。另外，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在备课时而在与本土教师交流过程中发现，本土教师相较于教育资源较好地区的教师，忽视文化的选择功能，无法根据本地学生的内心所需选择真正符合他们心理的文化知识与教学方法，对课本知识中存在的文化偏见感应不足。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常常被动参与“社会文化”会导致文化排斥心理产生，进而对“社会文化”感应的主动性降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感不强烈，导致文化感知难，进而导致难以实现文化回应。[4]

总之，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而导致的学生的主动选择性不强，教师难以选择真正符合孩子们心理的文化知识与教学方法，从而导致本土孩子内心对于民族、科技文化导致“弱感应”或者“不感应”的现象。进而会导致教育差异逐渐趋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

## （九）教育资源处于弱势地区孩子们无法完全掌握主流教学重点

在现如今多元文化交融的现实背景下，实用性是教育的基本属性，应用性是教育的基本要求。[5]然而，当今教育资源分配处于弱势的地区却面临着教育的实用性和应用型难以切实地彰显。根据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在相关领域的成长和发展中，都难以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去满足自身或社会的发展诉求。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目的的偏移，教育落脚点从服务社会发展，局限到等级考试、期末考试以及专业考试等层面上。而教育资源缺失的地区，在面对教育发展的情况，上述的问题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特别是英语、科学方面的课程上，各个学校的教学资源也逐渐偏离了“实用性”，忽略了知识的实用属性。

当实践团成员在课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学生进行辅导，了解学生英语程度时，我们发现该地区英语教学程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浮于知识传授层面上，而对学生能力培养、素质培养的内容普遍缺失。学生所反映的英语程度则仅仅是能反应出所给出的单词的意思，对于英语单词的发音以及句式的构成并未系统学习，“老师没有要求”便称为孩子们学习英语上的标准。而面对实验科学课程，学生们表示，并未具体去学这门课，课程主要是语数英三大课。根据实践团上课时学生对于实验课的反映情况表明，学生对于实验课的热情很高涨，并且在课后反馈可以看出学生很喜欢从中学习到知识点，，并且通过实验了解知识点的这一过程。这便体现出，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则并非是当下大背景下所有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所面临的的更加严重、深刻的问题，即本土学生对于主流教学重点的把握情况。

总之，在教育资源落后地区，对学生能力培养、素质培养的内容普遍缺失，加之学校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导致学校对能力培养与素质培养的重视程度相对低下。因缺乏对于课程的应用性、实用性，导致教育的文化功能弱化或难以发挥。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导致我国与各国的交流更加紧密之时，对学生各项能力素养的要求标准在不断地提升。对教育资源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力培养过程出现主流教育的偏差的问题，则需要格外重视，不仅要明确英语等语言类科目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以及科技类课程所体现出的对孩子们智慧、思想层面的培养进而提升孩子们的逻辑性能力，不然这必将导致教育资源差距将会持续性拉大，从而致使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 （十）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易出现教育城镇化过快所带来的问题

在教育不发达的地区，受“拆吋并乡”、“撤点并校”以及农民进城打工和乡村教育资源质量下滑的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越来越多乡村孩子进城读书。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中再次指出，城镇要重视流动孩子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要求“以流入地增幅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保障流动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些措施虽缓解了部分进城打工者子女读书难的问题，但这同时造成了乡村学校学生减少——不仅仅随迁子女进城读书减少了乡村学校学生数，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家庭利用这一政策将孩子送到教学条件更好的城镇学校，这致使乡村教育城镇化走在家庭城镇化的前面。

随着乡村教育城镇化的发展，它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学生属地管理制度，乡村孩子可以到城镇获得更好的义务教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想的教育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城镇化与城镇化协调一致”“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城镇化率与人口的城镇化率相一致”。[6]目前我国所遇到的现状则是乡村教育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出现“教育进城”而“家庭未进城”的不同步现象，即：过渡教育城镇化。

教育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教育城镇化会导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出现。根据甘露泽雨实践团成员在各自家乡的乡村调研结果发现，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的村庄中多数学校撤并，孩子进城读书。这带来了城村教育问题的叠加：在乡村，学生和师资大量流失，学校便出现了“超编缺岗”、“一师一校”、“全科教学”、“复式教学”现象，而留守教师素质“远达不到教学点特殊教学模式的需要，导致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证”，这便进一步加重了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7]在城镇，大量乡村学生涌入到城镇，尤其是县城学校，学校数量增加、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扩大以及学校宿舍、食堂、活动场所建设赶不上学生增量，一些县城出现巨校问题，一些学校出现七八十人甚至超百人的“超大班”问题。但是，由于城镇教育资源被大量进城的学生稀释，致使城镇学生和进城的乡村学生都不能充分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有研究指出，一些乡村孩子“花大价钱”到城镇学校读书，而进入的却是城镇资源薄弱学校，或被分在优质学校的所谓“弱班”中，接受的是与城镇孩子差异化的教育；一些地方出现了“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现成内部教育的二元教育结构”的情况。[8]从某种以上讲，教育城镇化也放大了教育资源不均衡地区现存的问题，即用一种平等造成另一种不平等。多数乡村孩子进城造成乡村学校空心化或撤销，以至于不能进城的孩子陷入读书困境。但我们要明白的是只要乡村有农民，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乡村教育，乡村教育城镇化发展不能丢下那些不能进城读书的孩子。

依照现如今部分地区教育资源不均的现状，部分地区，比如县城和一些中心城镇，也出现了以招收留守孩子为主的封闭式学校。这些学校相较而言学费不是很高，并且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虽然减少了外出打工的父母的后顾之忧，但是教学质量相对低于公立学校。即便在公办优质学校，乡村学生也被集中在“弱”班中，师资配置、教学要求相较于城镇学生或多或少有些差别。随着地方政府实行“合村并乡”进行“撤点并校”，一些孩子上学之路变得远了起来。尤其在2008年城市义务阶段教育实现免费后，一些地方把撤并乡村学校作为带动农民进城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策略。但是某些地方政府不切实际地推进撤校并点，致使一些地方的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脱节，造成部分学生尤其是经济状况不好家庭孩子读书难问题。

另外，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每一个农村家庭的核心，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让孩子住更好的房子、上更好的学，因此，很多乡村家庭到县城和中心城镇买房，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为小孩进城读书提供方便，还有一个是为孩子尤其为男孩子将来找对象增添砝码。因此可以发现，教育进城所带来的对家庭进城以及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之深。但是，乡村教育城镇化是在家庭城镇化不足或滞后下发生的，一些家庭子女进城读书不仅未能带动家庭城镇化，反而让家庭城镇化变得更加艰难。进城购房和进城租房陪读是乡村人获得城镇教育机会的应对策略。购房的直接目的是让子女获得进城读书资格，而陪读则是为了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父母细心的照料下更高效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进而考取优秀的大学。但是，子女进城读书或陪读让一些乡村家庭“劳民伤财”，让因打工分离的家庭变得更加不完整，大家庭中丈夫或儿子、儿媳在城镇打工，留守在村庄的家人又因孩子进城读书而再次拆分,更没有财力购买城镇住房，家庭城镇化的愿望也更难以实现。

## （十一）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学生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在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校中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进入内地高校后,由于文化基础薄弱、生活习惯差异和家庭经济状况欠佳等原因,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的负面心理倾向[9]。偏远地区的学生进入教育资源相对较好的地区，在思想状况、心理反应、学习表现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本土学生的明显差异。

从教育资源相较匮乏的地区考来的学生大多都是当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满怀希望，踌躇满志，选择远赴外地学习并提升自己，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但是，当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时，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节奏，教育资源好的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园生活习惯与想象差距巨大，甚至截然不同，易产生胆怯和畏惧心理，甚至感到无所适从，继而选择故步自封、自我封闭[10]

由于先前所在教育资源少的地区，来到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校学习，相较而言总体的教育基础相对薄弱，自学能力较弱的问题集中表现出来，特别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等公共必修课的表现上则更为明显。

实践团在社会实践期间，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学生进行走访调研期间则发现，由于学校并不将英语作为重点抓起，并且英语课堂上，则很少出现针对学生英语实用性的训练，以至于学生在参与支教夏令营课堂初期无法跟上小老师们的课程安排，甚至出现英文字母用拼音来读。由此可见，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对于英语等科目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由于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学生需要依靠国家助学贷款来缴纳学费,每学期的生活费也是寥寥无几。不得不减少的团建活动也让他们产生自卑感，而事实上他们内心渴望与同学交流,这种希望与他人情感交流与经济拮据之间的矛盾给他们带来焦虑和抑郁,使他们变得既敏感又脆弱。

城市与农村的明显区别,往往在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上集中体现出来,也常常导致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不能很快的适应。生活上的不适应,容易带来身体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精力不集中,上课不能很好完成学习任务,长时间持续会造成恶性循环,给学生身体和学生思想上带来双重压力。

总之，准确把握偏远地区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后产生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对提高来自偏远地区学生的培养质量,支持偏远地区的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解决措施及建议

##  1.经济发展是基础，鼓励“共享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们保持着战略定力，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十四五”规划，整体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但是中国毕竟地大物博，南北跨越纬度大，东西跨越精度广，因此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而经济的发展又和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填报、大学生毕生的工作选择息息相关，而大学生的志愿填报，工作地选择又和当地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教育资源分配这一块也是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因此针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代快速发展的机遇，利用好时代的契机。“共享经济”的发展会有效缓解由经济引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独特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首先，是市场的规模更容易扩张，更能够快速的扩张，在消费能力不是很好的地区，单品高消费所占比重不多，更多的是中低产品的消费，因此对于市场来说更应该提升交易的数量而不是交易单品的单价。这样就可以提升整体的市场作用，对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优势，社会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有效的利用，可以在疫情期间更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扩大市场来增加地区的经济效益，从而间接带动人才的吸引能力。同时，共享经济的灵活性极高。虽然网络无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的更近了。因此，也就产生了更高效、更合理的管理模式，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形势，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做出反应，来应对变化，更高效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济发展是大的、宏观的背景，是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发展，肯定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相对平衡分配，但是仅仅靠经济基础的发展肯定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相对平衡分配，还应该有其他的政策扶持。政府的职责是保证教育资源分配公平，能够在教育资源公平性将要或者已经失衡的情况下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而调节教育资源的重心应该放在公共财政的分配，在各学校需求的前提下以公平为首要的分配原则，缩小资源分配的差距，甚至可以给条件不是很好的地区给予相应的特殊照顾。

## 2.教师资源的分配建议

在本次社会实践中，我们前往了部分夏令营同学的家中进行线下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也和家长探讨了一下有关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有的家长表示，教育资源的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就比如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作为经济中心，这些天然的优势是不可能被完全抹平的。因此现阶段，关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只能尽可能缩小差距，做到相对的公平。

关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一大原因是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偏远、贫困不发达地区师资队伍主要呈现数量不足、教师结构不合理、薪资待遇与生活条件较差的特点。偏远地区教学专业教师数量不足，师生比偏大，需要大量补充师资力量。尤其对于英语教学、音体美劳的专业老师需求很大。据调查：青川县偏远山区其中一所学校—乔庄镇小学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率达73％，而真正学习这些课程的有27％，音乐老师的配备率也仅仅只有19.6％。 关于教师结构首先是性别结构不合理。在城市或者县城地区，女教师数量多于男教师数量。而在农村偏远地区，由于住宿条件、婚恋与人身安全等因素作用下，往往男教师数量多于女教师数量，且年龄普遍偏大，这不利于偏远村小教学环境的改善和长久发展；同时学科结构不合理。学校基本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教师数量基本满足，但音乐、生物、体育等学科老师资源紧张。在偏远小学，师资力量薄弱，常出现兼课老师或取消教授课程的情况，其结果要么是加大老师工作压力否则将降低学生听课质量，甚至出现义务教育未完全普及到位的情况。优质教师分布不均原因也来在于偏远地区教师工作任务大且生活条件艰苦。农村小学大多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条件差劲、生活条件艰苦，农村教师“包班、包年级”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加重了农村教师的工作量，同时可能需要承担宿舍管理学校清扫等管理任务。因此优质教师资源主动或被动流向县城和乡级中心学校。还需认识到的是农村小学教师学历普遍偏低，农村学校教师具备小学高级职称的比例远低于县城小学，具备小学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中，县城是农村的2.5倍。可以知道，提升乡村地区教师薪资待遇，优化职称评价制度非常必要。

 在家访过程中，就有的家长说虽然自己家的孩子所在的学校条件不错，硬件设备、设施较为全面，但是很明显不在城市内的学校，在乡村的小学的教学条件确实很是困难，因为学生少的缘故，老师就一个人教授多门课程。不仅仅是小学，大学也是，而大学的分布、布局，是与政策息息相关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教育资源实现相对平均分配上的重要手段之一。

### 坚持公费师范生补贴制度，优化生活成本政策

首先，政策应该保证“乡村教师”的基本待遇。

应坚决执行我国现行政策中有关提高公费师范生工资待遇和降低工作生活成本的部分。比如做好保证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的编制落实对接工作、教育局等机构联合校方积极提供办公场所和周转宿舍等必要的工作，提高教学生活条件，提升公费师范生的职业满足感。公费师范生或国家优选计划培养出的高校青年教师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具有较强的自尊心，期望得到领导、同事和学生的肯定与尊重。但受限于自身教学水平较低，授课经验不足，较难立即在科研与教学中有所建树。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经济收入低成为主要的职业特征。而转入偏远地区的公费师范生还要面临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利等多重外部环境压力。因此，政府应多部门协同治理，坚持公费师范生补贴制度，优化生活成本政策。

政府应该设定相应政策促进乡村学校的学校师资力量发展，对于地方相对偏远的、条件艰苦的地区乡村教师应该给予政策的特殊补贴，只有补助、津贴，以及相关帮扶政策的支持力度上去，才会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农村就业。同时，在吸引其他地区的教师来就业的同时，更应该鼓励当地毕业大学生返乡就业，鼓励大学生或者大中专毕业生回到家乡的学校就职，出台相关的保障、资助政策，会有更加利于当地教师教育资源升级。

毕业大学生返乡当老师的优势很多，首先相较于在外地当教师，可以有效缓解教师压力。对于很对外地教师来讲，身处他乡，虽然有学生的陪伴，但是思乡情结仍然是中华儿女们难以割舍的情结。如果在外地，回家的路途会占用教师很长的假期时间，因此大部分外地教师都不会选择回家，而是会继续守着空旷的校园，长期以来就会产生心理压力了，而对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倦怠感，最终外在体现就是精神状态会变差，教学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如果教师返乡教学，思想情结会得到很好的缓解，解决了心理负担，不仅对教师的心理是一种放松，对于教学来说更是一种很好的帮助，返乡教师能够更好地将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去。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计划生育影响“独生子”家庭的独生子女将会承担起社会工作的责任，因此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赡养父母）将会是未来一代人的难题，而返乡进行教学工作可以保证在有稳定收入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好父母。

提到返乡教师的教学工作，更重要的一点是返乡教师更能够了解当地的教学、学习相关政策，因为现在全国的高考政策、判卷评分标准很难做到完全统一，作为在本地经历过当地教育的人，返乡教师更能够知道教学重点、评分标准，相关政策，同时对于当地的民族习惯、禁忌忌讳、乡村方言都会很快地适应，这些也都会为教学顺利提供条件。

### 利用互联网提高改善生活条件后公费师范生的增加收益，提高阈值

教育部等机构在执行和调整相关政策时，除了衡量改善后的收益和成本，要想降低公费师范生的离职率，还需分析改善给公费师范生带来的增加收益，增加的收益至少要大于一个阈值，此阈值与公费师范生离职带来的机会收益、改善前的从教收益、工资待遇、工作生活成本、培养成本和违约金相关。因此，制定执行和调整政策时，应收集公费师范生离职带来的机会收益、改善前的从教收益、工资待遇、工作生活成本、培养成本和违约金的相关数据，科学确定公费师范生 离职带来的机会收益、改善前的从教收益、工资待遇、工作生活成本、培养成本和违约金。同时，要完善公费师范生的录用、调取和退出机制，使其呈现完整开放的状态，从而释放出制度活力，吸引更多有志向有情怀有能力的青年们加入乡村教师群体中来。

教师资源的分配，除了以上传统的教师资源汇集方式，还应该借助目前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充分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比如部分地区的英语教学，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有独特方言的地区，由于文化原因，导致英语的教学可能受阻。因此，可以通过网络，和其他地区的学校形成英语教学合作学校，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辅助推进英语教学的展开。其他课程也是如此，可以使得孩子们接收更多、更全方面地思路，使得事半功倍。

同时，除了小学、中学之外，大学的建设同样极为重要，往往一个地区的大学水平和当地的教学水平息息相关，涉及到人才培养水平，毕业生质量，而毕业生质量又和当地的就业息息相关，因此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分析出一条较为清晰地关系链：当地教学质量-小学中学教学质量-大学质量-毕业生质量-就业人员水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才吸引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反过来还会影响当地的教学质量。这条关系链就会形成闭环，如果从一开始，这个循环能够“自给自足”，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良性循环，那么这一切就会越来越好，正向发展。但是目前大多数地区的这个循环并不是良性，因此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开始改变都是可以的，而这其中的环节中，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吸引的能力，所以，在部分地区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条件下，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政策扶持，增加人才吸引力。在教师资源的分配条件下，任重而道远。

 关于教师资源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更要注意的是要加强教师自身能力、素养的提升。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培养新一代人的思想、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在思想上把好关，做到不跑偏，不滑坡。而现在的年轻人却都将教师看成了继公务员之后的一个“铁饭碗”：稳定且受人尊敬，教师的象征意义是享乐而不再是奉献。农村条件差、设备落后，因此就造成农村学校缺少年轻的教师，缺少真正的专科教师。因此，教师不光是要拥有扎实过人的专业知识，也要有一颗为教育事业奉献的心。如可在教师素养课程上设置培养教师正确价值观的内容，让年轻一代的教师从思想上做足准备，了解教师这一职责所呈现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唤起其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觉悟。

需要优化培养师范生、专业教师制度，加大对教师专业知识与素质培养的经费投入，给予一定的社会关注。200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8D%E8%B4%B9%E6%95%99%E8%82%B2/241515%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AC%E8%B4%B9%E6%95%99%E8%82%B2%E6%94%BF%E7%AD%96/_blank)。采取这一重大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并于2018年，正式将将“[免费师范生](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D%E8%B4%B9%E5%B8%88%E8%8C%83%E7%94%9F/5359266%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AC%E8%B4%B9%E6%95%99%E8%82%B2%E6%94%BF%E7%AD%96/_blank)”改称为“[公费师范生](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8%B4%B9%E5%B8%88%E8%8C%83%E7%94%9F/5667217%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AC%E8%B4%B9%E6%95%99%E8%82%B2%E6%94%BF%E7%AD%96/_blank)”，履约任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优师专项计划则是为了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推动和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2021年组织大学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提前批招生的一项计划。据了解，优师计划有三大原则：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为祖国教育水平发展困难地区输送稳定教师资源，助力教育扶贫。国家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师计划是目前主要的师范生升学渠道，实施以来，不仅为师范生提供了丰厚的学业补贴，稳定的就业岗位，更造福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行业。今年，一名高考成绩673的四川理科生报考了国家优师专项，毕业后，他将去往一所县中小学履约任教 6 年，而这个分数在本科提前批次里仅次于北大清华的调档线。无独有偶，云南一名 666 分的学霸不报浙大，不选南大，而是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国家优师专项。从两位应届高考生的专业选择，以及近几年不断上涨的公费师范生分数可以窥见政策的红利正在普及更多人。因此改善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首先是要继续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加大教育资金，提供公费师范生更保障的生活补贴，更专业的学业指导，更双赢的就业岗位。结合现当代科技发展迅速与疫情现状，我认为当今社会年轻人，尤其对于求职应届生和正处于专业选择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充满大变数的时代，“老师”这一职业背后象征的稳定和从容会更加有接受度。

### 运用科学技术，建立数据库，多角度多层次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7 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任重道远。仅西部地区有 410 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其中贫困县 215 个、少数民族县 309 个、边境县 51 个。这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多为高山、高原、高寒和荒漠、半荒漠地区，且教学环境、交通条件、生源基础等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影响公费师范生生存状况的因素较多、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对于公费师范生补贴政策、违约金制定赔偿政策不应该“一刀切”或“一成不变”。应当建立数据资源库，首先从系统的角度，注重公费师范生离职带来的机会收益、改善前的从教收益、工资待遇、工作生活成本、培养成本和违约金等相关数据的收集、清理、储存和分析。面对离职率较高地区，尤其关注注意离职公费师范生的主要去向追踪，同时对主要去向行业的工资待遇等所带来的收益进行科学测算。其次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智能分析系统，对于相关收益与成本的数据波动进行及时分析确认，为政策调整做好智能警报与监测的作用。最后公费师范生离职带来的机会收益、培养成本、违约金等各项金额调整涉及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多种政策、涉及教育部等中央机构、省级及地方教育机构、农村学校、社会团体等，且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性，因此，执行和调整政策时，可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合适的政策组合，注意各部门的协同。

### 职称评聘制度向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倾斜，为乡村教师开通绿色通道

#### 政府执行，各部门综合改革

 教育局与评定部门等机构映合理分配指标名额。在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改革进展中逐步解决“县城学校的指标是60%，农村学校是35%”农村学校指标率仅为县城学校50%这样的窘境，这是与多年职称评定秉持遵守的平等的标准背道而驰。每年职称指标都是按照省、市、县、乡层层下达，往往是城市学校高于农村学校，重点学校高于一般学校，中心学校高于村小学校。这样一来，资质相同的教师能否评上高一级的职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在何处。应该通过调整名额分配、实地调研、减少评称名额下发阻力等方面入手，为有资格且能力到位的乡村教师开通绿色通道。深化乡村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实行城乡体育教师分开评审，保持晋升机会的适度弹性，顺畅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道路。

#### 科学设置岗位

乡村小学教师职称岗位聘任的难点在于岗位类别划分不明确，存在依附义务教育教师岗位评聘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现象；岗位设置不科学，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小学的教师职称（职务）晋升需求；岗位使用效率低，不符合不同类型小学的教师职称（职务）晋升实际。因此，在职称岗位设置过程中应因地制宜，严格捋顺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对象校区实际教学情况、师资结构、评审对象、评审流程。教师评聘涉及多方利益，各部门协调困难，这就更应厘清岗位名额设置，公开透明评审过程。

#### 乡村教师职称评聘要切合实际情况

乡村教师评聘困难还在与客观条件不支持，硬件资源差。“学历要达标，论文、科研课题、教学成果、计算机合格证、普通话合格证、培训进修证一样也不能少！”提到职称评定，不少乡村教师苦不堪言。单就写论文来说，城市教师条件好，视野宽，写一篇论文可能轻而易举。而对乡村教师而言，有的连电脑都没摸过，资料无处查，图书无处找，写论文实在是“难于上青天”。因此，相关部门除了要加大教学设备投资投入，在评审过程中也要调整评聘标准，提供资源帮扶。

关注乡村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1. 关注女性教师家庭角色，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

 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一般担任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双重角色，在乡村，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往往更重视女性的家庭角色，所谓相夫教子。一个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往往是世俗观念中美满家庭的标配。而女性与社会建立起联系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工作角色。家庭伦理、亲人朋友要求女性能承担家务，照顾家庭，而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职业水平与质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对于对专业水平要求高的教师行业，同时处于观念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授课女教师压力冲突十分明显。传统的性别文化所造成的刻板印象成为乡村女教师的职业发展的一大顾虑，校方与相关部门机构应该努力帮助女性教师在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中进行转换，达到平衡状态，提高职业获得感。应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制度，如请假制度、节假日轮休制度、教学培训制度。除了，在制定政策上多站在女性教师角度考虑问题，更要结合实际情况与社会发展趋势。如当今政府推广二胎政策，校方应为决定生育二胎的女教师提供相应的完善的产后工作安机会与合理的“再就业”安排，缓解已经生育正纠结是否要二胎的女教师部分焦虑，减少因家庭原因而离职的乡村女教师数量。

1. 校方组织机会公平分配

以下为对于某县学校的主任进行的访谈记录。

对象：S 主任，男，工作21年

问：学校对于女教师专业发展有哪些奖励措施？晋升机会是不是更多地考虑男

教师？

答：学校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对教师进行的奖厕，并没有具体分哪些方面，也没有特别照顾女教师，大家都一视同仁，该表扬就表场。关于晋升机会，可能对男教师有所倾斜，原因是一方面考虑到女教师确实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考虑男教师能够更好地进行领导与组织。

由此可推断，乡镇存在缺乏针对激励女性教师发展的激励制度或有效措施。在我看来，首先，校方需要在精神上给予女性教师鼓励与支持。学校校长应多与女性教师进行沟通，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授课教师，生活条件艰苦，应多关注关心其生活住宿条件与安全，为女教师们竖起安全后勤“支持”。其次，要鼓励女教师多参与学校管理，对于女管理者，应适时减少课业任务，让其充分发挥女性的细致、耐心的优势。对于教育资源较贫瘠的地区，女性管理者的存在能够促进学校的整体发展与资源优化处理，同时，行政管理的经验也会促使乡村小学女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

1. 推广师徒制，实现实践共同体

师徒制是一种重要的在职教师培训模式。师徒制由来已久，简单来说，就是在校内或校与校之间，教师建立起“传、帮、带”的联系。现代的师徒制是在对现代的学徒制的借鉴和对职业教育的反思基础上产生并加以运用的，而将师徒制推广至乡村偏远地区学校，保留传统的纽带模式，创新实践对象，将范围集中在女性教师中有利于传承优秀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观念、塑造女性教师职业品格。因为女性身上共有的善用直觉思维、多重的角色身份的特征使得女性教师与女性教师更易发生情感经历共鸣、交换人生体验。对于刚步入教师行业的青年教师，尤其面对资源贫苦、设备落后、生源基础差的教学环境，必然对于未来的事情产生迷茫，游离于乡村教师这一职业身份，失去方向感，产生放弃的念头。但是，如果这位青年女教师在职业生涯成长道路上有一位拥有类似经验或能产生共鸣的指导者“老师”，她应该会更加踏实。

推进实践共同体是指将乡村教师职业规划列入师范学校或其他机构研究课题，让师范院校成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同行者。充分利用师范院校科研规划能力，结合乡村教师实际情况，设计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方向方法。

1. 提供专业职能培养平台，激发乡村女教师内生动力

正如马云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于秀红所言，要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平台，唤醒意识，人人参与。要集合联动各方力量，共同构建一个乡村女教师可以成长发展的平台，让女教师们能在“贫瘠”的土壤中看到实现自身价值、完成职业成长的希望与机会。如启动乡村教育家计划，着重培养学校发展战略；邀请明星参与、优秀教育家指导到乡村教学中来。

同时，女教师自身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素质，做好自身的规划与管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家庭生活与教育职业的发展，分清主次矛盾，厘清优先次序。

经过以上分析，教师资源、人才质量地提升，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可能不是一届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政府有足够的决心，充分的行动力以及持之以恒的魄力。同时当地教师也要确保自己的初心、决心、恒心，才能走在正确的教师资源的合理分配的道路上。这是多方面配合才可以达成的目的。

# 五、职业发展探索建议

 教育资源分配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的引发，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所处的周围环境、大政策方针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遗留性问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是长期以来，日积月累的结果。对于由于历史长此以往引起的问题，要想通过一朝一夕就改变这个结果是极其不现实的，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实现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的分配，表面上是成年人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此次支教所接触的这一代小朋友们“10”后们也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本次社会实践之中，我们甘露泽雨乡村振兴实践团一共招收了21名小朋友成为了夏令营的成员，同时也对这21名小朋友做了相关的调查，其中就涉及所接受教育的情况。很多来自广西河池的小朋友们有百分之63.3想离开家乡去其他地方读书，而填写问卷的家长们也有百分之50左右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外地读书接受更好地教育。

 同时在活动期间，我们对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对一的聊天，和他们用比较亲近的方式进行了谈话，对他们的梦想或者未来想从事的职业进行了访谈。其中大部分同学都是有一定的目标理想的，仍有少部分同学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懵懂的阶段，目前仍然不清楚目标在他们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重要性。

 我所对接的两个小朋友是两个小女生，其中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目标，另一个不太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因为她可能不太清楚梦想的重要性，没有确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说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因此，表面上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实际上还是要回归孩子们的教育上，其中，目标教育、职业探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之所以强调目标教育就是因为目标在任何阶段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目标在小学阶段，是一个启蒙的作用，能够让刚刚进入正式阶段的小学生有一个努力的初步方向。因为小学阶段，虽然离高考、工作还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但是一个目标可以让处在这个阶段、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事情做。这个目标虽然可能不切实际，可能和未来的发展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小学这个阶段正是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有较多可以去自我开拓的时间，也是可以去大范围、花时间去探索外面世界的一个阶段，往往在这个阶段，能够积攒大量的知识，虽然未来的目标、职业，都和小学阶段的目标职业有所不同，但是终究是在小学阶段了解了更多的知识，利用这个时间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为将来的目标的形成做好了坚实的基础，也极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发下自己真正的热爱，真正能够把热爱当做职业的途径。初中阶段的目标可能就需要更加的具体化了，大方向就应该有所把握了。初中的学习任务相对来说应该更重了，因为，中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较为重要的考试。在这个阶段，需要一个目标来不断地督促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劲头。

 我也询问了我的小朋友，她的梦想是做一名篮球运动员，她有明确的的目标，但是对于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模糊的。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没有切实行动的方向，那就会在实现梦想的漫长过程中是需要一定的成就感来满足自己，给自己加油，添加继续前进的燃料。因此，在初中阶段，就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较为具体的目标了，能够支持自己在初三保持学习的动力。

 因此，在小学初中阶段，可以算得上是目标的初级阶段，处于寻找阶段，因此学校需要在孩子们寻找兴趣、寻找目标职业的过程中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小学、初中应该把“职业探索”这门课程纳入到日常的教学计划中。可以制定相关的教学教育方案，比如小学阶段每个两个星期可以开设一门职业介绍的课程，让小朋友们通过课程了解各种各样的职业，在这个阶段，不一定要确定下来自己的未来发展职业，但是关键是要认识职业，对职业产生一定的认知

**教育资源的相对平衡分配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 参考文献：

1. 曹群. 德育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作用研究[D]. 吉林农业大学. [↑](#endnote-ref-0)
2. 曹群. 德育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作用研究[D]. 吉林农业大学.

方璐萍. 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endnote-ref-1)
3. 李碧涵.论中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J].现代交际,2011,(11):65. [↑](#endnote-ref-2)
4. 段可然.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探讨[J].亚太教育,2016(08):73.DOI:10.16550/j.cnki.2095-9214.2016.08.052. [↑](#endnote-ref-3)
5. 李优坤. 略论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思想教育的缺位[J]. 中国成人教育,2015(21):3. [↑](#endnote-ref-4)
6. 齐媛. 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青川县偏远山区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与对策》中国期刊网 《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中 作者：杨璇

《博弈视角下公费师范生到农村学校就业生存状况改善机制设计》付杰，欧阳建军

《关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 冀德荣 唐都学刊 第11卷

《收入分配差距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冷宗阳 硕士学位论文 2020年5月30日

《推进地方师范院校高质量教师教育建设》 王贤德 光明网

《大学生应该回家乡就业还是留在原城市》 辩论赛观点 百度文库

《2022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任泽平 金融界

《试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与根源》 杜春杰

### 《 教育城乡二元结构与教育城乡一体化两难的超越》 杜薇 李炳煌

《空间正义视角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齐军

### 《发展轨迹与历史经验：近代以来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战》 冉亚辉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年版） [董纯才](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3%E7%BA%AF%E6%89%8D%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

《[教育](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管理辞典》（1989年版） [李冀](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6%80%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

《教育大辞典》（1990年版） [顾明远](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E%E6%98%8E%E8%BF%9C%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0%86%E5%BF%B5/_blank)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民教育观念及其地区差异———基于江浙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比较》 李永萍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教育投资效益研究》 王艳杰

洪雨.透析教师继续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J].知识经济,2019(07):105+107.DOI:10.15880/j.cnki.zsjj.2019.07.063.

李韧平.共享经济背景下高校教育资源分配的政府治理[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03):245-246.DOI:10.16534/j.cnki.cn13-9000/g.2019.0235.

唐崇雯,唐昱.我国异地高考政策的利弊分析——基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视角[J].镇江高专学报,2017,30(01):10-12. [↑](#endnote-ref-5)